晚清文物市場與官員收藏活動管窺：以吳大澂及其友人爲中心

白謙慎
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

提　要

在收藏史的研究中，文物市場本應為不可或缺的一環。但由於資料的限制，以往的收藏史研究對市場鮮有涉及。由於晚清的資料相對豐富，本文即結合青銅器和書畫的市場價格變化來討論晚清官員的收藏活動，並進而觀察處於歷史巨變時期中國社會精英的文化消費模式。

關鍵詞：晚清、收藏、文物市場、青銅器、書畫

一、導言：收藏史研究的文獻問題

在近十餘年的中國藝術史研究中，收藏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研究成果也格外豐碩。僅以對明代中晚期的大收藏家項元汴的研究為例，近十年中，研究成果激增，出現數部專著。[1] 此外，其他的知名收藏家諸如豐坊、華夏、李日華、孫承澤、曹溶、梁清標、周亮工、宋犖、高士奇、安岐等，也都有專門的研究。除了上述這些學者們耳熟能詳的書畫史上的著名收藏家外，一些在過去被忽略的收藏家如清初的王鐸、王永甯、張應甲等，也隨著研究的不斷拓展和深入，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關注。

但是，在收藏史的著作中，學者們很少涉及文物市場的研究。這當然是文獻缺乏所致。研究晚清的收藏活動，如涉及文物市場，依然很有挑戰性，因為它不可回避藝術品的價格。但是在中國古代文人的正式著作中，很少提到藝術品的價格。晚清以前，雖然也有一些收藏家（如項元汴）記錄下他們購買書畫和古器物的價格，但今天能見到的這類記載少而零散，難以依據它們構成有效的論述。相對幸運的是，晚清文人喜歡寫日記，現在還能讀到數量可觀的晚清日記，其中有一些關於藝術品價格的記錄。由於年代還不太久遠，仍有許多晚清文人的信箚存世，其中也有涉及藝術品交易的內容。但是，這類記載通常十分簡略，如「某某山水軸，三十金」。我們並不知道所談作品的尺幅，加上在很多情況下，沒有實物或圖片，我們無法判斷藝術品的品質，對價格和藝術品之間的對應關係也就不甚了了。如果我們希望找出藝術品價格變動的一些規律，最理想的做法就是追蹤同一件藝術品在不同時期的賣價，而要做到這點非常不容易，因為能夠根據文獻記錄追蹤的例子極少。

存世文獻還存在著一個不平衡現象。那些提及藝術品價格的信箚，如果出自名人之手，保存下來的機率大，否則不然。如晚清官員吳大澂（1835-1902）寫給蘇州文物商徐熙（翰卿）、陝西文物商楊秉信（實齋，約 1831-1909 後）、山東文物商裴儀卿的部分信箚保留下來了，但是這些文物商寫給他的信箚卻佚失了。文物商們在當時肯定有自己的帳簿，但也沒有保存下來。

類似的情況也存在於不同的收藏群體中。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以後，上海成

1 它們是：葉梅，《晚明嘉興項氏法書鑒藏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6）；李萬康，《編號與價格：項元汴舊藏書畫二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楊麗麗，《天籟傳翰：明代嘉興項元汴家族的鑒藏與藝術》（臺北：石頭出版社，2012）；沈紅梅，《項元汴書畫典籍收藏研究》（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封治國，《與古同遊：項元汴書畫鑒藏研究》（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3）。

為經濟和文化中心，那裡居住著數量相當可觀的收藏家。可是，今天我們很難見到十九世紀下半葉上海收藏家的記錄。這大概是因為上海收藏家多為買辦和商人，不是官員和文人。這也是本文研究官員收藏活動的原因之一：官員們留下了比較多的文獻資料。

文物市場還具有一般商品市場所不具備的特殊性。文物通常不可批量生產（錢幣、陶瓷等情況有所不同），書畫更是如此，除去贋品，文物商所賣的應該都是獨一無二的原作（碑拓的情況稍微不同，但也不是簡單的複製品），文物商開價，差別可以非常大。吳大澂在致王懿榮（廉生，1845-1900）的信中說，山東濰縣的王石經（西泉，1833-1918）曾經給他看過一些古董，開價比他人高出許多。[2] 會賣東西的文物商，能把價格賣得高些。有時，同樣一件東西，張三賣給李四可能和王五賣給孫六的價格會差很多。文物商的能力，買家的知識結構，都會對最終成交的價格有所影響。這種差別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出市場的規律呢？

研究晚清的文物市場，還有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因素：計價的貨幣。晚清的貨幣體系比較混亂，人們在交易的時候，有時用銀子，有時用洋元。各地銀子的成色和重量、計價方法也不完全相同，不同時期洋元和銀子的比價、銅錢和銀子的比價也不同。此外，晚清硬通貨白銀的幣值還會受到國際貨幣市場價格變動的影響。這些都是我們在研究市場價格時需要考慮的因素。[3]

由於上述困難，本文對晚清文物市場的描述和分析是嘗試性的。本文主要研究同治、光緒年間的文物市場和政府官員的收藏活動。由於光緒在位時間（1875-1907）較長，本文所涉及的不少人物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前就已去世，吳大澂在甲午戰爭之後，不再購買金石書畫，並開始出售自己的收藏，所以，更準確地說，本文研究的時間段大約是一八六五至一八九五這三十年。[4]

本文的中心人物吳大澂，不但是晚清活躍的收藏家，而且他的身世、生活經歷使他有機緣和同治、光緒年間許多重要收藏家交往密切。他的家鄉蘇州是當時中國

2 「王西泉來此三日矣。挾古錡古布各數十，皆索重值。錡固可愛，價則相去太遠，恐不能成。渠不知甘丹大陰畿氏等大布，敝處已得三四十（價極廉），尚欲居為奇貨，殊為可笑」。（清）吳大澂，《吳大澂書劄》（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稿本，編號 4803，冊 3），頁 3-4。

3 在上面提出的這些問題中，有一些李萬康在其《中國古代繪畫價格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一書中已有所討論，讀者可參閱。

4 請讀者注意：此處中西年份只是大致對應，有時中曆的歲尾應是西曆下一年的年初，但為方便起見，本文仍以通常的中西對應年分繫之，而不繫於西曆下一年。文中的中文月份，皆農曆月份，故不用阿拉伯數字。

最富庶的城市之一，數百年來一直是文人文化的重鎮。吳大澂的外祖父韓崇（字履卿，1783-1860）是清代道光、咸豐年間頗有名氣的收藏家，並和當代一些著名的收藏家如陳介祺（壽卿，1813-1884）、吳雲（平齋、退樓，1811-1883）等都有交往。吳大澂家境殷實，他的父親也收藏書畫。受家庭和文化環境的影響，吳大澂從少年時就開始了收藏活動。在吳大澂的時代，顧文彬（1811-1889）、潘曾瑋（1818-1886）等蘇州士紳都熱衷收藏。蘇州府下屬的各縣，也都有著悠久的收藏傳統。吳大澂的友人常熟翁同龢（1830-1904）也是活躍的收藏家。

良好的地理和人文環境，也使蘇州成為一些喜歡風雅的官員退休後的定居之地。同治、光緒年間，著名收藏家、歸安人吳雲定居蘇州。其後，另一位歸安人沈秉成（仲復，1823-1895）和四川人李鴻裔（眉生，1831-1885）等，致仕後也定居蘇州，在那裡建造園林，收藏文物，並和吳大澂有密切的交往。

晚清官員沿襲著中國文人士大夫悠久的收藏傳統，以金石書畫為主要收藏對象。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金石收藏的品類和規模都有擴展，封泥、陶文、磚瓦、佛像、陶範等，得到收藏家們的青睞。限於篇幅，以下將圍繞著商周青銅器和明清書畫來討論晚清官員的收藏活動。

二、青銅器收藏

清代中期以後，收藏青銅器漸成風氣。收藏活動也刺激了陝西等地古器的挖掘。一些今天看來極為重要的青銅器，如散氏盤、大盂鼎、毛公鼎等，都在清代中期以後出土。同治年間，北京的官員中出現了收藏青銅器熱，引領風尚的是戶部侍郎潘祖蔭（1830-1890）。潘祖蔭開始有規模地收藏青銅器在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之間，他曾自述：「同治辛未、壬申年間官農曹，以所得俸入盡以購彝器及書。彼時日相商榷者，則清卿姻丈、廉生太史、香濤中丞、周孟伯丈、胡石查大令，無日不以考訂為事，得一器必相傳觀，致足樂也。」[5] 潘祖蔭所說的清卿即吳大澂，廉生即王懿榮，香濤即張之洞（1837-1909），周孟伯即周悅讓（1847 年進士），胡石查即胡義贊（1831-1902）。

吳大澂在一八六八年考中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可是他在京師並未久留，

5 潘祖蔭光緒九年為吳大澂《說文古籀補》（1894）所撰敘。

八月告假回蘇。一八七〇年臘月，吳大澂回到翰林院，次年參加考試，順利通過，列一等第三，授職編修。也就在翰林院任職期間，吳大澂開始收集吉金文字。[6] 王懿榮此時也在北京供職，他雖年輕，但嗜收藏，[7] 精於鑒定，在京師的收藏圈十分活躍，不少官員請其掌眼。潘祖蔭因公務繁忙，多倚重王懿榮為其奔走，打聽古董的消息。一八七二年，王懿榮給潘祖蔭寫了一封相當長的信，報告青銅器的市場行情：

> 頃自敞還，真興盡而返也。松竹合有字無字六七器，以重值歸西人。（含英與之通消息，亦云不錯。銅價一時烽起。昨尚與之酬酢，只此一宿，光景變局如此。）內乃作器彝，陽文父癸爵及一有字卣，又數爵，今早一齊取去。彝且在後，而陽文爵不得見矣。筠青數器少可者並二卣，均不在家。詢其夥，云被人借去陳設。及在旁聞他鋪言，云俱在敞內新設之講書堂議價矣。西人醫士某（布姓），今日計收器至千餘金，有字無字一氣合賣，並古泉亦收。前偽盤五百餘字之偽物，既歸聚和成，聞清閟又加價買回，以待西人。然松、筠各器僅存此數物，尚非上上品，而又為西人豪奪。從此並拓本亦不得有，真可浩歎也。要急，恐其居奇；而稍涉觀望，又入外夷。如之奈何！德寶破鏡，云係寄賣，而為其夥碰傷四五片者，暫不出，留以擋原主。[8]

信中之「敞」乃「廠」之異體，指琉璃廠，「松竹」、「含英」、「筠青」、「聚和成」、「清閟」、「德寶」皆古董鋪名。[9] 王懿榮告訴潘祖蔭，他剛從琉璃廠逛了一大圈回

---

6 吳大澂《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序云：「余弱冠喜習繪事，不能工。洎官翰林，好古吉金文字，有所見輒手摹之，或圖其形存於篋。積久得百數十器，遂付剞劂氏，擬分為二集，以所見、所藏標其目，略仿《長安獲古編》例，而不為一家言。其不注某氏器者，皆潘伯寅師所藏。此同治壬申（1872）、癸酉（1873）間所刻也」。顧廷龍先生撰《吳愙齋先生年譜》，根據序中所說「洎官翰林，好古吉金文字」，將吳大澂開始喜好吉金文字的時間訂於一八六八年吳大澂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的時間。但吳大澂這一年在京師逗留時間甚短，而在一八七一年初返回北京任職翰林院前，鮮有收藏吉金的記錄。從上引潘祖蔭在為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所撰敘可知，潘祖蔭開始有規模地收藏青銅器在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間，吳大澂開始關注吉金文字似乎也在此時。顧廷龍，《吳愙齋先生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

7 見王文章纂輯，《王文敏公年譜》：「時篤好舊槧本書、古彝器、碑版、圖書之屬，散署後必閱市」。呂偉達編，《王懿榮集》（濟南：齊魯書社，1999），頁 465。

8 （清）王懿榮，《王懿榮書箚》（上海：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冊上，頁 11）（頁碼系筆者所加）。此箚無日期，但此箚的前兩箚提到潘祖蔭將沙南侯獲碑拓片兩軸請吳大澂和張之洞題跋，信箋和此箚相同，應書於同一時期。潘藏兩軸今存上海圖書館，吳大澂的題跋寫於同治十一年（1872）壬辰孟冬。所以，可以訂此箚寫於一八七二年。一八七〇年代潘祖蔭寫給吳大澂、吳大澂寫給王懿榮、王懿榮寫給潘祖蔭的信箚，今天還有不少存世，為當時的收藏活動留下了十分珍貴的記錄。

9 在王懿榮的其他信箚中，他還提及「筆彩」、「蘊真」、「宜古」、「尊漢」等古董店。從晚清官員的日記中我們知道，「論古齋」也是當時琉璃廠一個甚為活躍的古董店。

家，向潘祖蔭報告在各個古董鋪打聽到的行情。其中最為重要的消息是，一位姓布的西方醫生正在大力收購青銅器，以致於青銅器價格一夜之間飛漲，有的店鋪甚至把已經賣出的假貨「加價買回，以待西人」。此時，在京的官員收藏家面臨著一個艱難的選擇：如急於購買，古董鋪勢必趁機漫天要價；而稍有遲疑，東西又將被西人購走。

信中所言布姓醫士，即英國醫生 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中文通常譯為卜世禮、卜士禮，有時也譯成布紹爾。卜世禮一八六八年獲倫敦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同年，前往北京擔任英國駐華使館醫師，並兼任京師同文館醫學教習。[10] 他在一八七〇年代初大肆購買青銅器，確實給京師收藏界帶來一個很大的震動。但是，這一震動似乎並沒有持續多久。因為在以後的信箚中，王懿榮沒有再次提到這位布醫士。從卜世禮的英文簡歷來看，他興趣廣泛，一八七四年開始在中國各地旅行，興趣轉向少數民族文字。在藝術領域，他後來更多的精力放在陶瓷的收藏和研究上。為什麼卜世禮沒有繼續收藏青銅器，究竟是財力不逮，還是覺得青銅器太艱深，真偽鑒定不易，有待進一步研究。一八七七年，吳大澂在致韓學伊（繼雲）的一箚中提及，「都中吉金皆為潘伯翁所得」，[11] 可見京師最大的青銅器買家還是潘祖蔭。

不過，一八七二年確實是京師青銅器價格迅速上漲的一年。潘祖蔭在這一年寫給吳大澂的信中憤憤地說：「市儈居奇，種種可恨，（古泉一個不成，已盡斥矣。）盡已揮斥矣。囊已罄，而索值者動輒盈千累百，真不顧人死活也」。[12]

---

10 卜世禮在中國居住長達三十二年，期間不僅精通了中文，還撰寫了許多關於中國藝術、錢幣學、地理、歷史等方面的論文。一九〇〇年退休後回到英國，此後出版了《中國美術》（Chinese Art，1905-1906）、《中國瓷器》（Chinese Porcelain，1908）、《中國陶瓷圖說》（Description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1910）等著作。一九〇八年在英國密德薩斯（Middlesex）逝世。此信息引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ephen_Wootton_Bushell，瀏覽日期：2015 年 7 月 1 日。

11 稿本，藏者不詳。此箚末尾有收藏者注「丁丑」（1877），從內容來看，也是吳大澂在一八七七年春末回到北京的那一年寫給韓學伊的。據臺灣大學盧慧紋教授相告，卜世禮確實買下了五百多字銘文的偽作〈晉侯盤〉，後捐贈給了 Victoria and Albert 博物館。卜世禮撰寫 Chinese Art 一書時也用了〈晉侯盤〉的例子，見 Stephen W. Busehll, *Chinese Art Second Edition* (London: The Board of Education, 1924)，冊 1，頁 72-6，圖 49-50。感謝盧慧紋教授以《略談卜世禮 (Stephen W. Bushell, 1844-1908)——西方研究中國藝術史的先驅》一文未刊稿見示。

12 （清）潘文勤，《潘文勤公與鬯齋尚書手箚》（江蘇：蘇州博物館藏，顧廷龍抄本，頁 1a）。潘祖蔭此箚的書寫時間可以訂在一八七二年的四月以後。因為他在信中提到了「齊罍拓收到」，齊罍拓指的是吳雲所藏的兩個齊罍的拓本。一八七二年三月初七日，時在北京翰林院任職的吳大澂在致吳雲的一通信箚中代潘祖蔭求齊侯罍的拓本：「伯寅師求拓兩罍真本，如破例為之，亦乞惠寄一分，並祈將師酉敦蓋請嵐翁拓寄一紙，至感，至感。」（清）吳大澂，《吳鬯齋尺牘》（上海：上海圖書館藏稿本）。此箚有月日無年份，因箚中提及曾國藩去世一事，可將此箚繫於一八七二年春。

一八七二年七月廿八日，吳大澂寫信給在蘇州的收藏家李嘉福（笙魚，1829-1894），向他打聽在南方的一個自乾嘉以來就流傳有緒的周代重器虢叔鐘：

> 笙魚六兄閣下，一別兩年，時光苒苒，企懷良友，我勞如何？近想履絢介祉，金石娛情，至以為頌。弟近日搜羅吉金拓片，與二三同志互相考訂，閑得小品數種，無可為知己告者。前聞書森云，吾兄新得一器，如蓮瓣，款識極精。想系匜之小者，可否拓寄數紙？如可見讓，乞示價值為幸。或有他器字文精確者，並望留意寄示拓本，即可議價。如銅質有破碎處，亦乞注明為要。尊藏黃山弟四燈尚在否？聞虢叔大林鐘在蔣寅舫處，需價若干，吾兄知之否？如晤退樓、養閑丈，均勿提及為禱。[13]

蔣寅舫即蔣光焴（1825-1892），字繩武，號寅昉，亦號吟舫，蔣光煦（生沐，1813-1860）的從弟，清著名藏書家。退樓即吳大澂的老師吳雲，養閑丈即潘曾瑋，潘祖蔭的叔父，兩人皆為住在蘇州的收藏家。吳大澂應該是受潘祖蔭的囑託，[14] 向南方的友人打聽虢叔鐘的情景，探詢蔣家是否願意出售。因為擔心吳雲和潘曾瑋也有意於此，蔣家居奇抬高價格，所以才囑咐李嘉福打聽虢叔鐘消息時，不要讓吳雲和潘曾瑋知道。

當吳大澂打聽到虢叔鐘的價格並向潘祖蔭報告後，潘祖蔭給吳大澂寫了一封信：「虢叔鐘索值二（謙慎按：或為「三」）千四百元，豈不可發一大噱乎？始知敝帚之物，未足云貴也」。[15] 潘祖蔭覺得這個價錢比琉璃廠賣的東西還貴。

潘祖蔭顯然對虢叔鐘的開價極不以為然。他在致吳大澂的另一通信中說：「此輩射利之徒，原不值與之計較。然使此輩以兄等為翁（覃溪）、阮（芸台）之流，此風斷不可長，且使南中好古者以為我等盲人瞎馬，與彼等同也。甚且抬出何

13 （清）吳大澂，《吳大澂手劄》（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編號 17678，頁 3）。此劄有日期「七月廿八日」。由於李嘉福住在蘇州，吳大澂於一八七〇年冬離開蘇州返翰林院任職，信中提到「一別兩年」，所以將此劄的書寫時間訂為一八七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14 吳大澂本人在翰林院的俸祿，不足以購買虢叔鐘。王懿榮在 1872 年左右致潘祖蔭的信中說：「清卿所收各器，均諦當，然皆二等貨。他日見之，則了然也。」（清）王懿榮，《王懿榮書劄》，冊下，頁 36。吳大澂之所以不能買到最好的青銅器，最重要的原因還是財力有限。

15 （清）潘文勤，《潘文勤公與鄧齋尚書手劄》，頁 14b。因為顧廷龍先生抄本有改寫的痕跡，也可能是三千四百元。如是二千四百元，約一千七百兩白銀，如是三千四百元，則約二千四百兩。當時幾種銀元與紋銀的兌換率：墨西哥鷹洋可兌換 0.7023 兩紋銀，英國站洋可兌換 0.6956 兩紋銀，日本龍洋可兌換 0.6922 兩紋銀。以鷹洋用的最為廣泛。參見邵義，《過去的錢值多少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一章第一節。

子貞，則亦一盲人而已，亦一空疏而已矣。尚不如壽卿之富也。」[16] 翁覃溪即翁方綱（1733-1818），阮芸台即阮元（1764-1849），乾嘉時期兩位重要學者、金石收藏家。何子貞即何紹基（1799-1873），晚清最著名的書法家，也是文化界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同治九年（1870），何紹基應江蘇巡撫丁日昌（1823-1882）之邀，主蘇州、揚州書局，一八七三年在蘇州去世。一八七二年時，何紹基在蘇州。[17] 想必是精於小學的何紹基看過此鐘，開價人便援引何紹基對虢叔鐘的讚譽來抬高此鐘身價。可潘祖蔭對此甚是不屑，[18] 以為何紹基並不像山東大收藏家陳介祺那樣通青銅器。言下之意，他若以如此高價買下虢叔鐘，定會被南方的同道視為「冤大頭」。

得知潘祖蔭覺得虢叔鐘開價太高，不願購買，吳大澂在一八七二年的初冬（壬申十月初七日）由北京寄給其兄吳大根（1833-1899）的信中說：「笙魚所得小匜，已見拓本（書森寄潘司農看）的係贋品（一小燈亦不真），無須問價。南中古器更少，佳者價亦更貴，如有拓本，寄來一閱。即向來至名之器，其值不可問，司農先生亦不能出此重價。都中時有出售者，其價較廉也」。[19] 吳大澂此信明確指出，當時南方的青銅器價格高於北京，連潘祖蔭（司農先生）也無力購買。

對虢叔鐘耿耿於懷的潘祖蔭不久又接連寫了兩封信給吳大澂：「今日晚間薄酌，無事，將阮、張、孫三家虢叔鐘細細校對，然後知其無一不偽。從此死心塌地，不復想此物矣。亦一快也。容日後面談。須知好古易受人欺耳」。[20]「鐘之難得，甚於他古器。除阮、張虢叔鐘未可深信外，壽卿之十鐘，其盡可信耶？此時固無由得十鐘以與陳氏匹，若其有之，兄以為正當修德以禳之也。宣和器六千有餘，以帝王而尚有播遷，且器盡毀於金亮。可畏也哉！」[21] 自負的潘祖蔭不但認為阮元和張廷濟（1768-1848）收藏的虢叔鐘都是偽器，同時代的大收藏家陳介祺引以為

16 （清）潘文勤，《潘文勤公與瘦齋尚書手劄》，頁 30b。

17 因為何紹基卒於一八七三年，此劄應寫於一八七二年。此時何紹基住在蘇州。翁同龢在同治十一年（1872）扶送母親靈柩回祖籍常熟，十月十九日翁同龢到蘇州拜訪老友，見到何紹基：「子貞七十四矣，足不能行，留滯江南何為哉」。（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上海：中西書局，2011），卷 2，頁 981。

18 潘祖蔭出身吳中望族，祖父潘世恩（1769-1854）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寫此信時他已任侍郎，並主持京師風雅之盟，故一向自視極高。吳雲在致吳大澂的信中說：「鄭盦目空一切，評騭人才，絕少當意」。（清）吳雲，《兩罍軒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影印光緒甲申刊本），卷 10，頁 21a（805）。

19 （清）吳大澂，《瘦齋家書》（上海：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冊 1）。吳湖帆注：笙魚即李嘉福，司農即潘文勤公，時官戶部侍郎。

20 （清）潘文勤，《潘文勤公與瘦齋尚書手劄》，頁 45b。

21 （清）潘文勤，《潘文勤公與瘦齋尚書手劄》，頁 46b。

豪的所謂「十鐘」也未必都可靠。

潘祖蔭話說得如此肯定，他的門人王懿榮也不得不附和老師的意見。他在一八七二年致潘祖蔭的信中說：「虢鐘是偽無疑，不惟平津館賞鑒不可憑，董賈帶來阮廟三器拓本，蓋無不偽者也。考據之學不惟後來居上，真是目見者比前人較多，所以事半功倍」。[22] 阮廟指阮元家廟藏的青銅器（包括虢叔鐘），平津館指乾嘉時期另一位重要學者、收藏家孫星衍（1753-1818），他也曾經收藏過一個虢叔鐘。王懿榮認為在鑒定和考證方面，後來居上，乾嘉時期的前輩大家阮元、孫星衍認為的真器，如今他們能夠辨為偽器了。

可是不久，王懿榮便轉變態度了。一八七二年臘月，王懿榮在致潘祖蔭的信中說，「元信已傳示清卿，敬繳。虢鐘究竟真偽，尚不敢定也。若以此較山農擬購萬金之說，差相類耳」。[23] 山農即李宗岱（？-1896），也是晚清金石收藏界的一個重量級人物。現在傳聞他願意出一萬兩銀子來買虢叔鐘，王懿榮不再斷言「虢鐘是偽無疑」了。

虢叔鐘的價格能開到如此高，與鐘鼎為青銅重器有關。陳介祺在致吳雲的信中說：「吉金以鐘鼎為重器，敝藏有十鐘，因名齋為十鐘山房。」[24] 人們常說鐘鼎彝器，就是以鐘鼎來代稱青銅禮器。雖說鼎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是權力的象徵，但由於鐘更為稀少，那些銘文長或和歷史上重要事件和人物相關的鐘（如虢叔鐘），就受到收藏家們的格外青睞，如果曾經名家遞藏和著錄，價格更昂貴（圖 1）。

不久，曾為張廷濟舊藏、後歸蔣家的虢叔鐘，被沈秉成購入。吳雲在致陳介祺信中說：「南中古物不獨金器為有力者收括殆盡，即碑帖書畫磁玉等類稍可入目者，價便奇貴。未翁所藏虢叔鐘後歸蔣生沐。辛酉年（1861）曾留弟處三月，諧價未就。去冬已為敝姻家沈仲復以重值購去」。[25] 吳雲此處所說的蔣生沐，即蔣光煦，浙江海甯人，家業充裕，遇金石書畫不惜千金，為晚清著名收藏家，也是上引吳大澂致李嘉福信箚中提到的蔣寅舫的從兄。太平天國時期，蔣家避居上海。而身為蘇州太守的吳雲，也在一八六〇年蘇州被太平軍攻陷後來到上海，籌畫保衛上海

22 （清）王懿榮，《王懿榮書箚》，冊上，頁 12。

23 （清）王懿榮，《王懿榮書箚》，冊下，頁 26。此箚的時間應在一八七二年臘月（西曆 1873 年初），因為在後面的信箚中，王懿榮提到了胡澍（1825-1872）去世。

24 （清）陳介祺，《簠齋尺牘》（臺北：古亭書屋，1969 年影印本），頁 998。

25 （清）吳雲，《兩罍軒尺牘》，卷 9，頁 7a-b（647-648）。

和收復蘇州。所以，吳雲在上海見到了蔣家收藏的虢叔鐘。由於蔣光煦在一八六〇年去世，不排除吳雲所記有一年誤差的可能性。蔣光煦去世後，蔣家收藏的虢叔鐘由其從弟光焴保管。

《兩罍軒尺牘》所收吳雲的信箚沒有日期，我們只能從信箚的內容來推斷沈秉成在哪年冬天購入虢叔鐘。在同一信中吳雲說：「本月五日，偉功來蘇，攜到二月廿四日手書，並《古泉匯》二套、富貴吉羊圖、齊刀範、建武範、綏和雁足燈、太康匽、漁陽郡甗、漢李夫人墓門字、魏金沙泉三字各墨拓。」吳雲還向陳介祺報告了何紹基的近況：「子貞兄今年正月間大病甚危，弟新正謝絕訃應，直於元宵後三日出門，首先到彼，在臥榻相見。執手嗚咽，涕泗滿頤，謂呃逆不止。眠不安枕，食不得味，與其病而生，不如速之死。想兄聞之定亦同喚奈何也！」[26]《簠齋尺牘》收有陳介祺癸酉（1873）二月廿四日致吳雲的信箚，其中提到隨信寄給吳雲「李竹朋親家《古泉匯》二冊」及富貴吉羊圖等墨拓，[27] 與吳雲回信中所說的內容完全吻合。而何紹基也是在一八七三年正月大病，數月後去世。因此可以斷定，沈秉成是在壬申（1872）冬，亦即潘祖蔭猶豫不決之時，在上海購入蔣家所藏虢叔鐘。此時，沈秉成正任蘇松太道台（首府在上海），俗稱「上海道台」，管轄蘇州府、松江府（包括上海市）、太倉州，是中國最富庶地區的行政長官，[28] 所以有能力購此重器。[29]

吳雲也沒有說沈秉成所出「重值」到底是多少錢。幸運的是，上海圖書館藏有潘祖蔭手抄金石雜錄和張廷濟信箚，在虢叔鐘條下恰有潘祖蔭的批註：「由生沐歸仲復，以五千金得之。」[30] 由此可知，沈秉成是以五千兩銀子從蔣家購得第二大的虢叔鐘，這在當時確實算是極其昂貴的了。

---

26 （清）吳雲，《兩罍軒尺牘》，頁 6a-8a（645-649）。

27 （清）陳介祺，《簠齋尺牘》，頁 1023-1024。

28 參見梁元生著、陳同譯，《上海道台研究——轉變社會中之連絡人物，1843-18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15、159。一八七一年，沈秉成從上海道台離任，定居蘇州，在那裡建造耦園。光緒三年（1877）三月廿二日，吳大澂致信陳介祺，告知去冬回蘇州省親之際，見到了沈秉成購買的虢叔鐘：「歸里所見器以沈中復師虢叔鐘為第一，即張氏清儀閣物，至今尚未往拓。」參見謝國楨編，《吳愙齋（大澂）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頁 124。也就是說，吳大澂在一八七六年冬，在蘇州見到了沈秉成所購原為張廷濟舊藏的虢叔鐘，並打算去親手拓此鐘。可見，當時的金石收藏家都以能見到此鐘為眼福，並努力想得到它的拓片。

29 《過雲樓日記》光緒三年（1877）正月初四日，「午後，李香巖來晤，偕至沈仲複處，觀其新得虢叔大霖鐘及仲敦，皆周器中精品。」見（清）顧文彬著，蘇州市檔案局、蘇州市過雲樓文化研究會編，《過雲樓日記》（上海：文匯出版社，2015），頁 431。不知為何比吳雲的記載晚了四年？難道沈仲復最初不願意給同道看，還是他當時尚在上海兵備道，有所不便？沈秉成的耦園在光緒二年（1876）始落成，難道是遷入新居後才將虢叔鐘給友人看？還是吳雲記載有誤，沈秉成不是在一八七二年冬而是在一八七六年冬才購得此鐘？

30 （清）張廷濟，《銅器聞見錄：張叔未書箚》（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潘祖蔭抄本）。

那麼，張廷濟當年又是花了多少錢買下虢叔鐘的呢？日本京都大學所藏張廷濟的《嘉興張氏清儀閣所藏古吉金之文》，有張廷濟所藏虢叔鐘拓片，旁有張廷濟本人題跋：「周虢叔大林鐘，孫淵如觀察舊藏，沈龍門曾拓本見貽。頃二月七日吳門鄭竹坡偕陳葦汀、徐蓉村攜此來余齋，售歸於余，價銀二百八十四餅。此視阮儀徵師所藏者略小，視伊墨卿太守所藏者略大。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四月六十叔未張廷濟記。」這一題跋告訴我們，在乾嘉時期，已為學界所知的虢叔鐘有三個，皆藏於當時的文化名人之手：最大者由阮元所藏；（圖 2）第二大者由孫星衍所藏，後歸張廷濟；最小者為伊秉綬（1754-1815）所藏。由於阮元所藏入了阮氏家廟，不再在市場上流通，所以，張廷濟去世後，曾由他收藏的虢叔鐘也就成為當時市場流通中最著名的一個周鐘。

徐珂（1869-1928）的《清稗類鈔》有「張叔未藏周虢叔大林鐘」條，簡略地記載了張廷濟所藏虢叔鐘輾轉流傳的歷史：

> 周虢叔鐘，鉦間文四行四十字，鼓左文六行五十字，舊為陽湖孫淵如觀察所得。嘉慶丁丑（1817）秋，張叔未得其自拓本。未幾，歸吳山尊。吳掌教揚州梅花書院，常陳設院中。斌笠耕觀察良思得之，不果。後歸兩淮鹺使阿克登布，得白金一千二百兩。阿既受替，復送歸吳以志別。吳歿，償歸張廣德銀號，值如歸阿之數。張又歸潤州某。以上轉徙之跡，趙晉齋言之最詳。道光辛卯春初，蘇州鄭竹坡以銀二百餅從潤州買得之。二月九日，偕陳葦汀、徐蓉村來售於張叔未，值銀二百七十餅，別酬徐十四餅。是時，每餅易大錢九百三十文。[31]

吳山尊即吳鼒（1756-1821），字及之，一字山尊。如果徐珂所記虢叔鐘的歷史基本可靠的話，那麼，在吳山尊去世的時候，亦即一八二一年，虢叔鐘的價格為一千二百兩白銀，幾經轉手，到一八三一年張廷濟購買時，僅二百八十四銀餅（約二百兩），十年中跌了好幾倍。可見藝術品的價格並不是總是上漲的。但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這個價格上的巨大差異，還有待研究。

不過，四十年後，虢叔鐘的價格再次飛漲。一八七二年有人向人在北京的潘祖蔭開價虢叔鐘「二（或三）千四百元」（大約一千七百兩或二千四百兩），潘祖蔭覺得不可思議。而同年冬天，上海道台沈秉成卻以五千兩買下四十一年前張廷濟購買

31 （清）徐珂編，《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 9，頁 4338）。

的那個虢叔鐘，價格翻了好多倍，可見著名青銅重器的價格在同治年間暴漲。張廷濟舊藏虢叔鐘如此昂貴有兩個原因：從銘文來看，它是西周初期的重器；從流傳史來看，它曾經清代兩位著名金石學家孫星衍和張廷濟的收藏。對書畫而言，歷代藏家的題跋和收藏印具有附加價值；對於青銅器而言，文獻價值和流傳有緒十分重要。

一八七〇年代青銅器價格飛漲，非但沒有讓收藏家們的熱情受挫，反而進一步刺激了他們的購藏欲望。一八七八年左右，潘祖蔭在寫給吳大澂的一通信中說：「近李眉生、沈仲復廣收古器，出重直，未與通信，無從見也。」[32] 在另一通信箚中，潘祖蔭又寫道：「平齋近通書否？李眉生、沈仲復所得，全恃平齋為耳目。度極真極精者，平老必自留之，其所得必極昂者耳」。[33]

上海圖書館藏有一冊《潘祖蔭手箚》，所收皆為致吳雲及其子吳承潞的信箚，其中第十開是一張小條子：「虢叔旅鐘（字文全，弟四，的真。在阮、張、瞿三家之外者，從來無人知之）」。[34] 可見，潘祖蔭後來也收到一個虢叔鐘，小於阮、張、瞿三家所藏。瞿氏所藏應為原歸伊秉綬的虢叔第三鐘。麓齋藏吳大澂在一八八六年致尹伯圜的信中提到了潘祖蔭藏虢叔鐘。[35] 說明潘祖蔭購入虢叔鐘第四在一八八六年前，而且他也不再認為虢叔鐘是假的。[36] 今天，研究青銅器的學者們認為，虢叔鐘應是八個一組，目前存世有五個虢叔鐘，晚清的收藏家們能見到其中四個。

青銅器價格在一八七〇年代飛漲，除了有外國醫生加入購藏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戰後經濟的復蘇。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國運動被剿滅，晚清進入了所謂「同治中興」時期。戰後初期，經濟凋敝，價格自然會低。吳雲致馮桂芬信箚云：「前月廿三日奉別解纜，廿四日申刻泊無錫西門外，一片瓦礫，寂無人煙。入城里許，始有

32 （清）潘文勤，《潘文勤公與窓齋尚書手箚》，頁 60b-61a。

33 （清）潘文勤，《潘文勤公與窓齋尚書手箚》，頁 61a-b。這兩通信箚沒有日期，但署款時潘祖蔭都寫上了「期期功」，說明正在為家裡的親屬服喪。而潘祖蔭寫給吳大澂的信中有多通署款時用「期期功」，有些可以根據內容系於一八七八年，所以，此處所引兩通也可訂為一八七八年。查《潘祖蔭年譜》，潘祖蔭的親屬中，潘祖蔭的伯父潘曾瑩和妻子於光緒四年（1878）三月三日同一天去世。「期期功」或是為這兩位親屬服喪。

34 收信人的上款為吳大人和吳廣庵，所以應該是吳雲和吳承潞。此冊書法差別很大，疑是不同時期的信箚拼成一冊。

35 參見白謙慎，《吳大澂和他的拓工》（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頁 64。

36 在吳大澂的《窓齋集古錄》中有三件虢叔鐘，其中兩件注明藏者，即阮元和張廷濟。另一件為誰所藏不詳。

店鋪約百家。食物皆有，弟於市肆中以四十錢買一漢人私印」。[37]

隨著戰後經濟恢復，收藏者逐漸增多，文物市場也日益活躍。在北京，潘祖蔭、吳大澂等官員開始收藏青銅器。在蘇州，退休官員吳雲、顧文彬、李鴻裔、沈秉成和著名士紳潘曾瑋等也在盡力收藏。大約在一八七三年，吳雲在致潘曾瑩（1808-1878）的信箚中提到：「南中自兵燹以後，好事者頗多。書畫碑版稍可入目者，價便騰貴。吉金類多贋鼎，其著名之器，價必以千計……壽卿屢次來書，欲託在吳中購覓金石，蓋不知近時情形也」。[38]

在距蘇州不遠的上海，戰後也崛起了一批新的收藏家。吳雲在致陳介祺的信箚中講到，當時在蘇州地區找拓工很難：「因兵亂以後，吳中講此道者甚屬寥寥，稍有薄技，便赴滬上，該處最號繁盛，覓利較易也」。[39] 連技術稍好些的拓工都往上海跑，因為那裡謀生容易，可見收藏金石的人不少。

在一八七〇年代和一八八〇年代，上海一個富商出手不凡，引起了官員收藏家的關注，他就是湖州南潯的顧壽臧（子嘉）。在一八七〇年代，吳大澂便和顧壽臧建立了聯繫。吳大澂曾於一八七五年花朝為顧壽臧作〈溪山圖〉（圖 3），此圖有吳大澂的孫子吳湖帆的邊跋：「光緒乙亥時公年四十一歲，方由陝甘學使卸職時也……當時吳興顧子嘉商榷吉金文字甚密。是圖高曠獨絕，亦徇知之作也。」[40] 但吳湖帆所記有誤，因為此時吳大澂還在陝甘學政任上。不過，吳大澂和顧壽臧有比較密切的金石交往卻是事實。吳大澂在光緒三年（1877）三月致陳介祺的信中談到，他在上海見到了湖州顧氏所藏魯伯厚父敦和遽伯還敦。[41] 吳大澂在一八七七年回到北京後，向潘祖蔭談起了顧壽臧的收藏，潘祖蔭也有意和顧建立聯繫。大約在一八七八年左右，吳大澂在致潘祖蔭的信箚中說，「師意欲贈顧子嘉一聯，可作一

37 （清）吳雲，《兩罍軒尺牘》，卷 2，頁 14b（108）。黃小峰統計了杭州人陳昌吉著錄他在太平天國戰亂後文物市場尚未恢復期間購買的「宋元明清歷代書畫四百五十一件，總值約四千七百四十兩，平均價格只有 10.5 兩，可以想見大亂後江南書畫市場嚴重衰退的情形。」黃小峰，〈「隔世繁華」：清初「四王」繪畫與晚清北京古書畫市場〉，《藝術史研究》，2007 年 9 輯，頁 169。

38 （清）吳雲，《兩罍軒尺牘》，卷 3，頁 14a（183）。因信中提到「《彝器圖釋》十二卷業已授梓蔵工。俟便當寄請是正。」吳雲的《兩罍軒彝器圖釋》刊於同治十一年（1872），故訂此箚書於一八七三年。

39 （清）吳雲，《兩罍軒尺牘》，卷 9，頁 33b（701）。

40 見二〇一〇年上海朵雲軒春季藝術品拍賣會編號 1230。

41 謝國楨編，《吳愙齋（大澂）尺牘》，頁 124-125。

書介紹之」。[42]

潘祖蔭在一八七〇至一八八〇年代致友人的信箚中，多次提到顧壽臧：「聞南中金蘭生以千七百金得之。富商顧姓以二千金，金不售也。然則齊鎛真廉。而弟已困矣」。[43]「滬上新有富人顧子嘉，年二十餘，以二千金得虢叔鐘，然云非其得意之物，亦知不佩服平齋等。其人似不尋常，恐晉公盦已歸之也。聊以奉聞，可見近日此道竟成風尚矣」。[44] 顧壽臧以二千金購買到的虢叔鐘，不知是否為曾經伊秉綬舊藏的虢叔第三鐘。他年紀輕輕，財大氣粗，甚至連大藏家吳雲等，也不放在眼中。

不過，在吳雲看來，顧氏並非金石學家，只是個好附庸風雅的商人，雖然出手闊綽，收藏也不過爾爾。吳雲在致潘祖蔭的信裡寫道：「顧、蔡二君皆少年喜事，一時高興，廣收古玩。顧君所收金器為多，蔡則專收書畫。近則情隨事遷，意興已替矣。簠齋謂好古而存傳古之心，斯為真好。此非可與尋常人言也。顧處金器卻有數件佳者，然亦非煊赫著名之器，不能望尊臧項背也」。[45] 大約在一八七六年致潘祖蔭的另一封中，吳雲又說：「顧姓收買吉金並非真好，現倩人往拓全分，而其人又因訟事赴天津，將來必欲搨取奉寄。所臧亦止有三四十種，精者不及半耳。比之八囍齋中猶滕薛之於齊楚，不可同日而語。」[46] 八囍齋即潘祖蔭的齋號，在吳雲的眼中，商人還是不及有教養的士大夫懂收藏。

光緒九年（1883）正月，潘祖蔭的父親去世。四月，潘祖蔭護送父親的靈柩回故鄉蘇州埋葬並在那裡守喪，一直到光緒十一年五月才回到京師。守喪期間，潘祖蔭和蘇州的收藏家互動密切，並對南方的青銅器收藏有了更為直接的瞭解。在致友人的信中，潘祖蔭寫道：

> 近來古緣若何？祈詳示。此地沈、顧、李皆大有力。沈以千金得項氏閣帖，以二千金得陳眉公之閣帖（即前年在京者）。又聞得宗周鐘，觀其拓本，恐是後刻。李眉生不在蘇，暫遊何處？顧則有子不肖，現在正生氣，不見人也。聞重直得一鄭刑叔鐘，亦是偽物。吳氏之物，廣安觀察（承潞）秘不肯出。此地好古者除三家外無人。家叔之古器佳者已歸三家。

42 （清）吳大澂，《吳大澂致潘祖蔭信箚》（北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頁 11。
43 （清）潘文勤，《潘文勤公書箚》（上海：上海圖書館藏稿本），開 15。
44 （清）潘文勤，《潘文勤公書箚》，開 18。
45 （清）吳雲，《兩罍軒尺牘》，卷 8，頁 10a（571）。
46 （清）吳雲，《兩罍軒尺牘》，卷 8，頁 19b（590）。

> 上海一顧商亦豪於貲收古器，恒軒知之，兄則不識也。三家中聞李眉生最精，惜無從見耳。[47]

潘祖蔭所說的沈、顧、李，即沈秉成、顧文彬、李鴻裔。在蘇州，潘祖蔭在青銅器收藏上還是有所斬獲。光緒八年（1882）顧文彬的愛子顧承去世，《過雲樓日記》光緒九年（1883）年末附記「自承兒歿後，余古玩之興索然已盡。泹鐘售與潘伯寅，七百金。提梁卣亦售與，價六百金。」[48] 由此可知，顧文彬的部分收藏以高價轉讓給了潘祖蔭。

正當晚清收藏家開始肆力收藏青銅器之際，「一八七一年，新興的德意志帝國打敗了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法蘭西，取得了五十億法郎的賠款，仿效英國，建立世界上第二個金單本位制度的強國，世界金銀比價就從一八七三年起，開始發生劇烈的變動。僅僅在一八七三年到一八九四年的二十二年間，金銀比價就從 15.9323 漲到 32.5873，即漲了一倍。」[49] 金貴銀賤的劇烈變動是否會對晚清文物市場的價格有所影響呢？中國大陸在上世紀五〇年代，五十元人民幣就能買一張齊白石的小畫，同樣的畫現在可能賣五十萬元人民幣，卻不能簡單地說漲了一萬倍，因為那時的五十元價值絕對不等於今天的五十元。一八七〇年代後青銅器價格飛漲是否會受到國際銀價下跌的影響，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以上所談乃鐘鼎重器。如果買其他類型的青銅器，就會比較便宜。比如說一個爵，在一八七〇年代的北京，二三十兩白銀就能買到。潘祖蔭在一八七三年致吳大澂的信中說：「松竹商祖己爵以配商卣甚妙，若能以三、二十金為得之，大妙。」[50] 吳大澂在這一年致王懿榮的信中說：「英古一敦，兄以卅五金得之。如知其來歷，大可省數金也」。[51]

一八七三年，吳大澂出任陝甘學政，在陝西大力收集古物（包括青銅器）。由於陝西是青銅器的重要出土地，青銅器價格遠比京師低。一八七四年秋，吳大澂

47 （清）潘文勤，《潘文勤公書箚》，開 22-23。潘祖蔭說「此地」，是時他應該在蘇州，亦即他在蘇州守喪期間。吳雲一八八三去世，其中一信提到看吳雲的收藏要其子吳廣盒同意，所以，吳雲已經去世。李鴻裔一八八五年去世。所以這些信大約寫於一八八三年潘祖蔭剛到蘇州不久，因為此後潘祖蔭和李鴻裔在蘇州過從甚密，留下不少信箚。

48 （清）顧文彬著，蘇州市檔案局、蘇州市過雲樓文化研究會編，《過雲樓日記》，頁 542。

49 楊端六編，《清代貨幣金融史稿》（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頁 277。

50 （清）潘文勤，《潘文勤公與窓齋尚書手箚》，頁 22a。

51 （清）吳大澂，《窓齋赤牘》（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頁 5a）。頁碼為筆者所加。

致王懿榮信箚：「仲秋道出鳳翔，以十金得一破敦；乃號仲城號時所作，其地又為西虢故地，此兄平生第一快事。」[52] 吳大澂收藏中最重要的周窓鼎（吳以此顏其齋為「窓齋」），有銘文二十八字，吳大澂在西安僅以一百兩銀子收得。[53] 而沒有銘文的青銅器則更為便宜。

自從金石學在宋代興起以後，它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收集、著錄、解釋金石銘文。所以陳介祺認為，「好古必以文字為主也」。[54] 對銘文的重視也反映在晚清文物市場的價格上。一八七三年下半年，吳大澂將視學陝甘，吳雲在致吳大澂的信中說：「關中金石固多贋品，然沉霾於荒邱廢堡者，亦時有呈露。金器無文字者，僅與廢銅同價。鄙意倘得式樣奇古、朱綠燦然者，亦大可收羅，作為案頭陳設，饒有古致」。[55] 在吳雲看來，沒有銘文的器物，最多只有觀賞價值，而無歷史研究價值，因此價格十分低廉，「與廢銅同價」。

由於青銅器有無銘文在市場上的價格差別巨大，所以便出現了偽造銘文的現象。吳雲在致潘祖蔭的一通信箚中說：「近日偽作者，愈出愈奇，滬上已專有此一種人，廣收無字舊器，合數人之力，閉戶覃精，偽舖成文，比之宣和仿古，實能遠勝。蓋器本原舊，文又工緻，目前已不易識，數十百年後，恐巨眼者亦不能辨矣。」[56] 在無銘文或銘文短的青銅器上，仿刻銘文或加長銘文，以增加市場的價值，[57] 這一造偽現象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晚清古董收藏中對歷史傳統的重視。而作偽和辨偽也成為文物商和收藏家之間魔與道鬥法的較量。

三、書法與繪畫

和商周青銅器相比，傳世書畫的量多得多，收藏圈也更大。吳雲曾經告訴潘祖蔭：「此間講書畫之友頗不乏人，獨至金石考證之學，落落少可與言。」[58] 吳大澂及其師友，如潘祖蔭、吳雲、李鴻裔、沈秉成、顧文彬、王懿榮等，都收藏書畫。

52 （清）吳大澂，《窓齋赤牘》，頁 20b。
53 顧廷龍，《吳窓齋先生年譜》，頁 59。
54 （清）陳介祺，《簠齋尺牘》，頁 201。
55 （清）吳雲，《兩罍軒尺牘》，卷 10，頁 5b（774）。
56 （清）吳雲，《兩罍軒尺牘》，卷 8，頁 33a（617）。
57 相關討論請見松丸道雄，〈陳介祺與蘇氏兄弟——關於陳氏的古董收集〉，孫慰祖等編，《陳介祺學術思想及成就研討會論文集》（杭州：西泠印社，2005），頁 340-342。
58 （清）吳雲，《兩罍軒尺牘》，卷 8，頁 19a（589）。

但是，在這些喜愛收藏的官員中，除了顧文彬有《過雲樓書畫記》外，都沒有專門的著錄，我們只能從他們的日記、信箚、詩文、題跋、收藏印中獲取其中的收藏資訊，推測他們的收藏規模和特色。吳大澂雖然熱衷收藏，也寫日記，但殘存的日記，基本沒有購買文物的資訊。翁同龢（1830-1904）、顧文彬、張佩綸（1848-1903）、江標（1860-1899）的日記則頗有書畫買賣活動及價格的記載。下面將以《翁同龢日記》中的記載為主，輔之其他文獻，來討論晚清的書畫市場。《翁同龢日記》記載的收藏和買賣活動最多也最詳細，並且他提到的一些重要藏品至今還由他的玄孫翁萬戈先生收藏，使我們能夠準確地瞭解這些作品的尺幅和藝術品質。

需要指出的是，書畫市場的情況常常比青銅器市場更為複雜，因為書畫中尺幅和品質的差別更大。在絹紙上所作的書畫，還可以通過題跋和鈐印來不斷地追加藝術、文獻和市場價值。和繪畫相比，書法的判斷有時要容易些。熟悉古代書法的人們，可以通過記錄中字體和書寫內容來大致判斷尺寸的大小。如光緒六年（1880）八月初一日，顧文彬「以二百元得趙松雪草書千文卷，為孫蓮塘先生舊藏。」[59] 趙孟頫的草書，字通常不大，風格較為穩定，〈千字文〉字數也明確，有了這些資訊，這一手卷的大致尺幅可以推算出來。二百銀元約等於一百五十兩銀子，這是一八八〇年趙孟頫草書〈千字文〉在蘇州的價格。

（一）晚清文物市場上的早期書畫名跡

由於大量的古代書畫名跡已經在清代初期和中期進入內府，晚清已經沒有像梁清標（1620-1691）、安岐（1683- ？）那樣的書畫大收藏家。但是，仍有一些未入內府的名跡尚在晚清的市場上流通。[60] 咸豐十年（1860）九月，英法聯軍侵入北京，圓明園被搶掠焚毀，一些內府收藏流入市場。同年十月二十日，亦即圓明園被毀的一個多月後，翁同龢在潘祖蔭處見到「〈茶錄〉、〈薑遐碑〉二帖，皆澱園散落者，索直甚昂，且留之以待珠還耳。」[61] 澱園即圓明園。此後的數年，圓明園流出的書畫不時在市場上出現。同治二年（1863）四月初三日，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

---

59 （清）顧文彬著，蘇州市檔案局、蘇州市過雲樓文化研究會編，《過雲樓日記》，頁 516。

60 我們從晚清收藏家的著錄中（如顧文彬的《過雲樓書畫記》和龐元濟的《虛齋名畫錄》等），也能多少瞭解到曾在當時市場流通的一些明代以前的繪畫。

61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1，頁 112。圓明園被焚毀搶掠後，清廷曾設法追繳，並追回一部分丟失的文物。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圓明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冊上），頁 571-597。但是，從後來還不斷有內府藏書畫出現在廠肆來看，很多東西並未追回。官員收藏家見到這些文物時，也並沒有要求賣家繳回內府。

> 博古齋送來唐人寫〈法華經卷〉，自十八至二十凡三卷，共十五紙三百三十行，字法遒緊，下開趙、董，有項子京印記，孫氏豔秋閣物也，索直不多，擬亟收之，真如窶人獲寶矣。於博古齋得見顏魯公告身墨蹟，前有高宗御識（藏經紙），後米友仁、蔡襄觀款，董其昌跋，徐知白詩，皆如阮文達《石渠隨筆》所載。又右軍〈遊目帖〉，僅有徐知白兩跋，亦有御題數詩，小楷。此跡疑是雙鉤本，徐跋稱其紙真晉時麻箋，如薄金葉，索索有聲，未敢盡憑。顏書古淡，洵是奇物，前在孫松坪處一見之。兩卷索價五百，皆庚申年澱園被兵流落人間者也。[62]

同治四年（1865）閏五月，原清內府收藏的唐摹本王羲之〈行穰帖〉也出現在廠肆。[63]

除了王羲之的〈行穰帖〉、〈遊目帖〉、顏真卿的〈自書告身帖〉外，我們從晚清官員的日記中得知當時市場上流通的名跡還有王獻之的〈新婦服地黃湯帖〉、[64]蘇軾的〈黃州寒食帖〉、米芾的〈多景樓詩〉、[65]〈向太后挽詞〉、[66]〈珊瑚帖〉、〈復宦帖〉、[67]〈樂兄帖〉、[68]黃山谷小卷、[69]文彥博墨蹟卷等等。[70]

除了黃山谷小卷所指為何不詳外，上述名跡（儘管有些翁同龢認為不真或為摹本）今皆存世，其中有些名跡在當時的價格也有記錄。王羲之的〈遊目帖〉和顏真

62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1，頁 294-295。

63 「聞右軍〈行穰帖〉在廠肆」。（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1，頁 432。〈行穰帖〉現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

64 光緒十年（1884）七月初三日，「過廠，見宋僧北磵酬梅坡詩跡，有姚廣孝二跋、簡庵諸僧跋、吳匏庵跋、覃溪跋，成王借摹入帖。卷首吳君篆。郭河陽〈關山行旅卷〉（亦細勁，錢牧齋跋，餘跋皆偽。）二卷，索每卷二百金，可笑也。又大令〈新婦服地黃湯帖〉墨蹟（有成王、英相跋，是鉤本，筠清館所藏也）」。（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4，頁 1897。

65 光緒三年（1877）五月十六日，「過廠見東坡墨蹟〈自我來黃州詩〉（御題），李北海〈古詩十九首〉，皆偽；米〈多景樓詩〉，趙十二箚，惟趙箚粗可觀」。（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3，頁 1325。

66 光緒十年（1884）八月三十日，「得見米襄陽挽詞小楷真跡，後有董臨兩頁並跋，前黃石齋隸書『鎮此數行，奚殊鞏帶』八字，真物也，索千金，後有墨本，是崇禎時刻，末有陳眉公跋，而米冊內卻無之。又新刻三紙，則米書董跋具在，卻未佳」。（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4，頁 1913。

67 張佩綸癸巳（1893）四月初七日日記：「清秘又持二帖來。一〈珊瑚帖〉，一〈復宦帖〉，快雪堂曾刻之。由安儀周輾轉歸傅文忠、成邸、定邸。索價千五百金，讓至千金。無力購之。內人暇中雙鉤之，惟妙惟肖，亦閑中一樂也」。（清）張佩綸，《澗於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頁 1831）。

68 光緒二年（1876）四月廿二日，「於廠肆見…米書樂兄尺牘墨蹟，墨光飛舞，真物也，跋卻偽，索二百金。（明日再看，系雙鉤本。）」（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3，頁 1240-1241。

69 翁同龢光緒六年（1880）十月初七日日記記載：「過廠肆，得見黃山谷書小卷，極愛之。（六十兩，論古）。」（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4，頁 1557。

70 光緒十年（1884）四月廿八日，翁同龢「見文潞公墨蹟三紙卷，米元暉、向若冰二跋，成王、榮郡王跋，頗好。價則甚昂矣。（博古，百廿金。）」（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5，頁 1978。

卿的〈告身帖〉這兩卷加在一起在一八六三年文物商才索價五百兩。此時太平天國戰亂尚未結束，文物市場的行情自然會受到影響。但黃庭堅的書法小卷，在一八八〇年開價僅六十兩，也低於我們今天的想像。米芾的〈向太后挽詞〉在一八八四年開價一千兩。米芾的〈珊瑚帖〉、〈復宦帖〉合卷，在一八九三年開價一千五百兩，殺價後一千兩。從一八六三年至一八九三年，整整三十年。從絕對的銀兩數來看，文物價格有了很大的增長。至於實際增長多少，還要考慮到生活指數的變動等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晚清文物商所開之價（即索價）往往會和實際成交價差別很大，成交價低於開價的三分之一、一半、甚至一半以上是經常的事。比如說，大約在一八七〇年左右，趙之謙（1829-1884）在北京為潘祖蔭購買文物，他在致潘祖蔭的一箚中說：「錢叔美畫一幅，索十六金。如要，可以說價，隨還幾金均可。惟鑒後須將畫付下，說成再送上取價也。」過了些日子，趙之謙又寫信給潘祖蔭，告知「錢叔美畫已買成，刻賣畫者甫去。計價八金，此畫尚便宜，若在杭州，非二十元不可也。」[71] 成交價比開價正好低一半。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因此，瞭解晚清藝術品價格的變化應該以成交價為依據，以索價為參照資料。

一些五代宋元畫作也出現在翁同龢等人的日記中。如衛賢的〈盤車圖〉、[72] 董源的〈寒林重汀圖〉、[73] 北宋燕文貴的畫卷、[74] 宋徽宗摹張萱的〈搗練圖〉、[75] 宋徽宗絹本山水卷、[76] 惠崇的〈江南春〉、[77] 南宋劉松年的青綠山水、[78] 宋元畫冊

71 王玉良、程有慶編，《趙之謙信箚墨蹟書法選》（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3），頁 251-252，第 64 箚、72 箚。

72 光緒十六年（1890）十月初二日，「於筆彩齋見宋人〈盤車圖〉（衛賢畫）、黃子久卷、范華原卷，皆妙，皆燒殘，索重價，不敢問。」（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5，頁 2445。

73 光緒十五年（1889）十月廿六日，「歸至廠肆一觀，見董北苑大幅。（眉題：魏府所藏董元山水天下第一。董其昌。軸上隔水洪瑩記。）奇筆也。」（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5，頁 2364。從董其昌的眉題可以得知，這張畫即現藏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寒林重汀圖〉。

74 光緒二年（1876）五月五月十七日：「過廠見燕文貴畫卷、倪雲林小幅，皆佳。」（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3，頁 1246。

75 光緒七年（1882）十月十三日，「得見宣和臨張萱〈搗練圖〉，金章宗題字，高江村物。（張紳題）」（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4，頁 1734。

76 光緒五年（1879）三月廿九日，「少仲借聽楓山館招集真率會，同席者仍余等五人。少仲出示友人托售之宋徽宗山水畫卷，余不收絹本，讓與香嚴，以二百元得之」。（清）顧文彬撰、李軍整理，《過雲樓日記》，載蘇州市地方誌辦公室編，《蘇州史志資料選輯》，第 37 輯（2011），頁 97。讀者請注意，李軍整理本和上引點校本所記內容並不完全相同。

77 光緒四年（1878）九月廿七日，「見吳仲圭草書〈心經〉，又宋人〈江南春〉畫卷，（畫二百，字八十。）即還之。」（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3，頁 1418。翁同龢並沒有說〈江南春〉為惠崇所繪，但今傳世最有名的宋人〈江南春〉畫卷由惠崇所繪，權繫於惠崇名下。

78 光緒九年（1883）元月二十一日，「於論古齋見方方壺雨山、劉松年青綠山水、巨然筆墨、煙客仿梅花道人，又一幅仿某君，（有再題數行），皆佳。」（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4，頁 1759。

頁、[79] 宋人〈群仙高會圖卷〉、[80] 范寬、黃公望、倪瓚的畫卷等。[81] 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廿三日，翁同龢「一日無事，展觀石谷畫圖，忽思廠遊，徑往，日落矣，攜〈東方朔畫贊〉兩冊（國初拓）、〈張猛龍碑〉、《宋元人畫集錦冊》歸。宋元冊極有精神，決知非蘇州片，索值卅金，擬得之矣。」[82] 一個《宋元人畫集錦冊》索三十金，大約二十餘金就能拿下。一八七一年正是潘祖蔭等在北京開始收藏青銅器的時候，二十餘金大約能買一個沒有銘文的商周青銅爵，當時的古畫價格不及青銅器高。宋徽宗絹本山水卷，在一八七九年的蘇州大約賣一百五十兩銀子（見本文注 76），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也不算高。

在晚清的文物市場上，雖然仍有一些唐宋元書畫在流通，但數量可觀的官員收藏的主要是明清書畫，而其中最受歡迎的則是以劉墉（石庵，1719-1804）、錢澧（南園，1740-1795）為代表人物的乾嘉名家翰墨和清初王時敏（1592-1680）、王鑒（1609-1677）、王翬（1632-1717）、王原祁（1642-1715）、吳歷（1632-1718）、惲壽平（1633-1690）亦即「四王吳惲」的繪畫。[83]

（二）明清名家翰墨

由於年代相去不遠，晚清的文物市場上仍有不少明代書法，其中以吳門諸家書法和董其昌（1555-1636）墨蹟居多。光緒十四年（1888）正月十四日，翁同龢見到〈祝枝山寫唐詩〉，認為是真跡，文物商開價三十金。[84]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文物價格已經有很大的攀升，祝允明的書法開這個價，實在不高。

同治五年（1866）十月初三日，翁同龢見到董其昌臨《閣帖》十冊，「先公曾鑒賞，今重逢之，欲以十二金暫質，未知見許否也。」翁同龢打算以十二兩銀子為訂金暫留十冊董其昌書法，可見當時董書的價位也不高。[85] 同治五年（1866）十二

79 光緒四年（1878）七月初八日，「得見董香光所藏宋元畫十二幀，雖皆麟爪，然神光逼人，哀悴為之眼明。」（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3，頁 1405。

80 光緒六年（1880）七月五日記載：「粵人胡蘧庵骨董中市儈，賞鑒極精，購去宋人〈群仙高會圖卷〉，張即之書殘經兩冊，宋拓〈家廟碑〉、明拓〈夏承碑〉、線斷〈皇甫君碑〉，惲南田畫雞扇面，共價洋七百三十元。價已不輕，聞其轉售他處，獲利數倍」。（清）顧文彬撰、李軍整理，《過雲樓日記》，頁 102。

81 光緒十二年（1886）十二月初十日，「前日得見大癡為仲和作山水卷，予百金不售，擬還之矣」。（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5，頁 2113。

82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3，頁 1208。

83 相關的研究，可參見黃小峰，〈「隔世繁華」：清初「四王」繪畫與晚清北京古書畫市場〉。

84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5，頁 2215。

85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2，頁 521。

月十九日，翁同龢「以七金得董自書詩卷」。[86] 一八六〇年代，正值太平天國戰爭結束不久，文物市場的價格較低可以理解。可是十年後，亦即光緒二年（1876）正月十四日，翁同龢「飯後遊廠，購得董書長吉詩卷、王夢樓條（共十兩）。又見金冬心臨華山碑橫幅、劉石庵書袁君墓誌冊，皆絕妙，價極昂也。」[87] 董其昌書李賀詩卷加上王文治（1730-1802）的條幅，才十兩。而金農（1687-1763）和劉墉的書法則「價極昂」。

同年，三月廿一日，翁同龢在琉璃廠見到「黃石齋詩立軸（是將赴義時筆，詩後跋數語悲壯）。……以廿金得黃字，懸之座旁，足起頑懦。」[88] 以二十兩銀子買進黃道周（1585-1646）自跋的絕筆詩軸，真是不貴。

明清官員雖然在日常生活中書寫大量的書法，但在任官期間通常不賣字，他們的書法（如對聯、條幅、手卷、扇面等）多為禮品。[89] 他們去世後，昔日的禮品進入市場，成為商品，不但數量很多，而且價格並不低。根據顧文彬的記載，光緒六年（1880）四月初四日，「仲復以八十元購得翁覃溪隸書對一副，其句云：有情今古殘書在，無事乾坤小屋寬。乃張瘦銅句也。下方錄瘦同原唱七律及覃溪、蔣心餘、吳穀人諸君詩，故如此名貴。」[90] 當時的八十銀元相當於五十多兩銀子，翁方綱的一副對聯能賣這個價格，遠遠高於上面提到的祝允明、董其昌、黃道周的書法。而昂貴的原因則在於此聯的下方有諸多名家的題跋，展現了文人之間的交往，具有追加的價值。但即便如此，高於黃道周的自跋絕筆詩軸，還是不可思議。

除了對聯、條幅、手卷、扇面這些為觀賞而作的書法外，隨著時間的推移，官員和文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功用性書寫（如信箚、日記、筆記、手稿等），也有了商業價值。光緒十三年（1887）十二月二十日，翁同龢「過廠肆小勾留，見柯丹邱畫竹石甚好，陳老蓮人物、南園信箚、何子貞詩稿，皆余所喜者也」。[91] 何紹基卒於一八七三年，十多年後，他的詩稿之類的日常書跡也在市場上流通了。

在日常功用性的書寫中，最大的一宗還是書箚。古代文人之間的書箚往還頻

86（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2，頁 535。
87（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3，頁 1219。
88（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3，頁 1233。
89 白謙慎，〈晚清官員日常生活中的書法〉，《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2014 年 1 輯，頁 240-245。
90（清）顧文彬撰、李軍整理，《過雲樓日記》，頁 101。
91（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5，頁 2208。

繁，[92] 很多文人都有保存友朋信箚並裱成冊頁的習慣。而古代尺牘一直是歷代收藏的重要內容，上面提到的〈遊目帖〉、〈樂兄帖〉都是尺牘。光緒十五年（1889）正月二十三日，潘祖蔭的門人江標（1860-1899）在其日記中寫道：「書賈送來書箚兩本共六十餘通，皆與桂未谷、顏運生兄弟者，索值百金，可云貴矣。」光緒十七年（1891）二月二十七日江標在其日記中又寫道：「骨董人送來錢竹汀與曹慕堂箚十八通，索值百金，可云貴矣。」[93] 桂未谷即桂馥（1736-1805）、錢竹汀即錢大昕（1728-1804），都是乾嘉時期很有文化聲望的官員，他們書寫或收到這些信箚的時間，距江標差不多正好一百年，索價百金，真是相當昂貴了。

受文化風氣的影響，乾嘉時期名臣和著名文人的墨蹟在晚清倍受青睞，市場價格也反映了這一時尚。在當時的北京官場中，劉墉和錢澧的字最受歡迎，價格不下於、甚至高於董其昌，此乃時代審美風氣使然，時代久遠並非是價格高低的決定性因素。[94] 翁同龢的日記多次提到這兩位先賢的書跡，選錄數條如下：同治十年（1871）四月廿九日，「見錢南園對極佳，價極昂。」[95] 光緒十一年（1885）正月十四日，「得蔣文肅〈塞上中秋〉詩畫小方、張天瓶扇合幀（十一兩）、〈兩峰采菊〉小幅（同上），斌為我致之。又劉石庵七言對。（十二兩）」[96] 劉墉的對聯比羅聘（兩峰，1733-1799）的小幅畫貴。「昨見錢南園書〈枯樹賦〉、真書〈千文〉，皆佳，其後人從家中攜來者也，議價不成。又見劉石庵為怡園太史書冊，中年筆，極精。」[97] 光緒十二年（1886）元月十四日，「斌以覃溪翁臨方正學〈溪喻〉卷（索五十金）、劉石庵字冊（四十）歸，賞之。」光緒十三年（1887）八月十八日，「於朝房買得錢南園楷書二小幅，尚佳。」光緒十六年（1890）二月廿五日，「過廠肆，買石庵字四幅，才四金耳。」[98] 劉墉的四幅字「才四金耳」，翁同龢真是撿著漏了。

劉墉和錢澧的書法在京師價昂，當是有相當一批官員喜愛和競相購買的結果。

---

92 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年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曾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他發現中國文人特別重視書面語，也十分喜歡寫信，即便是住在同一個城市，距離很近的朋友，也經常書信往返，而不是見面談話。參見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箚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27，29。

93 （清）江標，《笘詒日記》（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稿本）。

94 關於這一現象，上引黃小峰的論文業亦指出並有所討論。黃小峰，〈「隔世繁華」：清初「四王」繪畫與晚清北京古書畫市場〉。

95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2，頁 886。

96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5，頁 1949-1950。

97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2，頁 884。

98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5，頁 2034、2179、2388。

早在同治三年（1864）十月十二日，翁同龢去拜訪祁寯藻（1793-1866），兩人討論了劉墉和錢灃的書法特色。翁同龢日記這樣記載：「謁祁相國，壁懸錢南園臨〈論坐帖〉，極奇偉。相國指謂余曰：試觀其橫畫之平，昔石庵先生自稱畫最能平，此書家一大關鍵也。」[99] 翁同龢不但欣賞劉墉、錢灃的書法，甚至還臨摹之。光緒十二年（1886）九月廿日，「歸家摩挲書帖，遂似醉人，臨石庵詩卷數百字」。[100]

上引這些例子說明，收藏風尚和當時京師流行的書法品味有關。曾多年供職翰林院的何紹基，是晚清影響最大的書法家。他的書法厚重又靈動，和劉、錢一樣皆有顏字為根基。此外，廷臣如李鴻藻（1820-1897）、潘祖蔭、翁同龢、孫家鼐（1827-1909）、徐郙（1838-1907）、王懿榮等的書法都寫得工穩溫潤，具有廟堂之氣。乾嘉廷臣劉墉和錢灃端莊雍雅的書風自然會得到了他們的喜愛。

翻檢長期住在蘇州的官員收藏家顧文彬的日記，則不見有嗜好劉、錢翰墨的記載。或許劉墉和錢灃長期在京師為官，南方流通的作品較少，或是在審美趣味上有地域上的些許差異。

（三）明清繪畫

上面提到，在晚清的文物市場上，仍有一些宋元名跡流通。翻檢吳大澂同時代的一些書畫著錄，也能看到明代以前的古書畫。但是，吳大澂及其友人收藏最多的還是明清繪畫。

光緒二年（1876）四月廿二日，翁同龢「於廠肆見仇實父祝文衡山六十壽畫幅，衡山自題二詩，極精；唐六如〈蹇驢落日圖〉，皆立軸，每軸百金。」[101] 仇英（約 1494-1552）為慶賀文徵明（1470-1559）六十大壽的畫軸，有文徵明本人的題詩，誠為兩位吳門大師的合作，既稀有珍貴又品質精良，索價才一百兩。同年七月初八日，翁同龢「以四十金購仇實父〈獨樂園圖〉。」[102] 三年多前，沈秉成在上海就已經以五千兩銀子買下號叔鐘。如果仇英為文徵明祝壽的畫軸能還價至八十兩甚至更低的話，那麼一個青銅器重器的售價可達仇英精品的七八十倍。

四年後，亦即光緒六年（1880）九月十六日，顧文彬在蘇州「以二百元得仇

99（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1，頁 382-383。
100（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5，頁 2091。
101（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3，頁 1240。
102（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3，頁 1261。

十洲〈瑤台清舞卷〉於鐃齋之子銅士處。此卷心藏已十餘年矣，價亦昂甚。聞銅士以此項助賑，其好義可風也。」[103] 二百元約值一百五十兩銀子。由於直接從藏家手中買入，沒有文物商作為仲介，價格通常會便宜些，但顧文彬認為此價「昂甚」，這既有可能因為他心儀此卷十多年，願意出高價購入，也有可能得知對方是賣畫賑災，所以出高價成全善舉。

九年後，亦即光緒十五年（1889）正月十日，翁同龢「過廠肆見仇十洲畫〈後赤壁〉卷（寶珍，還七十）。」[104] 古董店開價多少不詳，但從翁同龢的還價來看，仇英這張畫卷的開價大概在一百至一百五十兩之間。

有了吳門大家仇英做參照，我們就可以來看看晚明的書畫大家董其昌的畫價了。翁同龢在同治六年（1867）三月初二日，「以十六金購董畫卷」。[105] 光緒六年（1880）十月初二日，「得見香光畫四頁甚佳，索價二十金耳」。[106] 同年的十二月十四日，「得見董文敏雙畫卷，一仿〈煙江疊嶂〉（絹本），一仿北苑（紙本，眉公小輞川詩）。皆景氏物，妙絕，索數百金也」。[107]「景氏物」即翁同龢的好友景其濬（？-1876）的舊藏，景去世後，其家藏漸漸流入市場。兩件絕精的董其昌手卷，開價數百兩，還價後，一卷應該在二百兩以內。光緒十年（1884）正月初九日，翁同龢「得見董香光仿倪樹石（眉公題、夢樓題）軸，（卅兩得之）」。[108] 有陳繼儒（眉公，1558-1639）和王文治（夢樓，1730-1802）題跋的董其昌畫軸，三十兩可得，如此看來，在晚清的市場上，董其昌的畫並不昂貴。

光緒十三年（1887）十一月初五日，翁同龢「晨在朝房攜陳老蓮畫卷歸，畫真而跋偽，擬以四金購之」。[109] 雖說翁同龢未必能以四兩銀子買到陳洪綬的畫卷，但他心目中的價位起碼說明，當時陳洪綬畫作的價格很低。

清初四僧畫家的畫作，在當時的市場上也沒走紅。光緒四年（1878）九月廿三日，翁同龢「得石濤畫詩小冊。（十五金，仍還去）」。[110] 石濤的詩畫冊，文物商

103（清）顧文彬撰、李軍整理，《過雲樓日記》，頁 103。
104（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5，頁 2294。
105（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2，頁 552。
106（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3，頁 1419。
107（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4，頁 1571。
108（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5，頁 1948。
109（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5，頁 2197。
110（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3，頁 1417。

出價十五兩，價格和劉墉一副對聯差不多，翁同龢仍沒買。同年十月廿三日，亦即見到石濤詩畫冊整整一個月後，翁同龢「見石谷〈李成關山蕭寺〉軸，極佳。（丙午，八十三矣）」。兩日後，翁同龢在其日記中又寫道：「石谷畫幅四十金可得，而囊無餘資，只得割愛矣」。[111] 一件被翁同龢認為極佳的王翬（石谷）畫軸，賣四十兩，不但比他同時代的畫家石濤的價格高，也比早些的董其昌和陳洪綬高。但是，這四十兩的價錢在晚清市場上的王翬畫中，並不算昂貴的。[112]

黃小峰在一篇研究晚清北京古書畫市場的論文中指出，當時京師官員們最喜歡收藏的是四王吳惲。[113] 如同潘祖蔭是晚清京師青銅器收藏的重要推手，翁同龢是當時京師四王吳惲最重要的買家之一。翁同龢是蘇州府常熟縣人，四王吳惲中，王翬和吳歷是常熟人，另外三王皆為太倉人，除了惲壽平是武進人外，其中五位都和蘇州有關。翁同龢喜歡四王吳惲可能有仰慕鄉賢的因素，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如黃小峰所指出的那樣，四王吳惲代表了清初以來的正統畫風，符合京師官員的審美趣味，因此在市場上價格不斷走高。

翁同龢的日記中，有關四王繪畫的買賣記錄甚多。[114] 其中有兩件成交的名作至今仍由其玄孫翁萬戈先生收藏。其一是王翬的〈長江萬里圖〉，縱 40.2 釐米，橫 1615 釐米，堪稱巨觀（圖 4）。翁同龢在光緒元年（1875）購得此卷，他的日記對何時初見此卷、文物商送看、討價還價、最後成交的過程，均有簡略但生動的記載，爰錄於後：三月廿六日，「排悶到廠肆，得見石谷仿江貫道〈長江萬里圖〉卷，長六丈餘，高尺許，天下奇觀也，索千金。」四月十九日，「午前博古齋以石谷〈長江萬里圖〉送看，凡五丈，真妙跡也。……晴窗展玩，凡數十卷舒，不能釋手矣，惜乎無力購致耳。」四月二十日，「出城，過廠肆，論畫卷價，予以三百猶未首肯，亦太甚矣。」廿二日，「賈人持石谷卷去，非四百金不售也，為之怊怏。出城，旋入城，無謂賓士，可恨。」廿三日，「重見〈長江圖〉，以舊藏四卷對看，目前一樂也。」五月初五日，「還博古齋帳，竟以白金四百易〈長江萬里〉。」[115] 這一長卷文

111（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3，頁 1422-1423。

112 光緒二年（1876）十二月廿五日，「有持石谷畫卷來者，長一丈一尺，癸酉歲作，頗蒼老，以三十金收之。」（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3，頁 1295。但是，王翬的畫作索價通常不低於一百兩。

113 黃小峰，〈「隔世繁華」：清初「四王」繪畫與晚清北京古書畫市場〉，頁 165-191。

114 在翁同龢的日記和其他的文獻中，涉及四王吳惲畫價的資料不少，上引黃小峰的論文附有四王吳惲在晚清市場的繪畫價格表，讀者可參照。

115（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3，頁 1160、1164、1165、1168。

物商開價一千兩，幾經周折，最終以四百兩成交。四百兩在當時的北京可以買一處不錯的住房。[116]

翁萬戈先生所藏的另一件名跡是王原祁的巨幅山水軸〈杜甫詩意圖〉，此畫縱 321.3 釐米，橫 91.7 釐米，號稱天下第一大王原祁畫作（圖 5）。王原祁「經營盤礴，兩月始成」，無疑是一件精心之作。翁同龢在光緒十三年（1887）六月初二日，「得見麓台長幅一丈，畫杜律『雷聲忽送千峰雨，花氣渾如百穌香』詩意，巨觀也。（為文翁先生畫，簽張若靄題），董公仿梅道人冊八開，極妙；戴鷹阿畫十二開，亦妙，皆茹古齋物。王索四百金，董、戴百六十。」[117] 五天后，亦即初七日，翁同龢「以三百金購得麓台巨幅、董冊八頁、戴鷹阿冊一，自恨好畫成癖，犯多欲之戒。」[118] 從開價便可以看出，王原祁的畫軸比董其昌和戴本孝（鷹阿，1621-1691）的兩本冊頁加起來的價錢還高出一倍多。而三件作品的真實價格是三百兩，按開價時的比例推算，其中王原祁畫作的成交價約二百兩，董、戴兩本冊頁約一百兩。這其中固然有王原祁的畫作是一件尺幅巨大的精心之作的因素，但四王畫價高則是當時的一個普遍的現象。

其實，翁同龢在購買王原祁〈杜甫詩意圖〉的半年前，就曾高價購入王原祁的一個手卷。他在光緒十三年（1887）元月三十日的日記中寫道：「以巨金買麓台畫卷，賈人索錢，怒斥之，已而悔之。」六天以後的日記記載：「以二百金買麓台卷，吾之過也。」[119] 在晚清的書畫市場上，手卷和冊頁的價格通常高於立軸，這也是為什麼一個手卷的成交價能和〈杜甫詩意圖〉這樣的巨幅畫作價格相同。翁同龢的日記還告訴我們，當時收藏書畫，過二百兩者，即為「巨金」。

從一八七〇年代末開始，四王吳惲畫作的價格不斷攀升，四王的索價通常都會超過一百兩白銀。光緒四年（1878）十一月十七日，「看王石谷〈溪山霽雪〉卷，極妙。（索百六十金）」。[120] 光緒五年（1879）七月初七日，翁同龢「見王圓照仿古

116 翁同龢用來買畫的這筆錢，本來是打算用來買房的。《翁同龢日記》，同年四月廿四日，「是日妾陸來城寓，以為移居吉日，不知我尚忍言移居乎。」（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3，頁 1166。翁同龢十分珍愛此畫，多次請友人觀賞。此畫現今由翁萬戈先生收藏，翁先生正在撰寫一本研究此畫的專著，無疑會對我們瞭解此畫的藝術特點很有助益。

117（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5，頁 2163。

118（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5，頁 2164。

119（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5，頁 2127-2128。

120（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3，頁 1426。

十頁，精妙，無力收之」。四天后，「有以王圓照畫冊來者，索百金，遂還之」。[121] 這說明，王鑒的一個十開的冊頁索價一百兩，實在不低。

進入一八八〇年代後，四王的價格似乎以更快的速度持續高漲。光緒十一年（1885）六月十六日，翁同龢「得見王麓台畫卷，仿大癡〈寫春圖〉，吾邑鹿樵先生所藏也，索七百金」。[122] 同年七月十五日，翁同龢「晨看字畫，麓台長卷，斌孫為我以二百八十金得之，可喜也」。[123] 光緒十三年（1887）十二月初五日，翁同龢「得見王圓照臨古十八頁冊（楊又雲藏，極妙，索六百金，論古齋）」。[124] 上面提到，一八七九年，王鑒十開的冊頁開價一百兩，一八八七年，十八開的冊頁開價六百兩。雖然成交價很可能要遠低於開價，但這兩個開價的顯著不同，也能讓我們感受到四王的畫價在一八八〇年代的上漲。

數年之後，張佩綸在他光緒十七年（1891）十月初一日的日記中，對時人爭出高價購買四王吳惲做了如下評論：「近人收求四王吳惲，爭出高價，於是真贋雜陳，往往割裂舊畫，改題其名，續鳧截鶴，毀壞名跡實多。永寶前以惲冊見示，亦頗清妍，而失之薄弱，其題中多別字，然索價三百金。論古一冊較佳，價至五百金。而畫已黯淡失神」。[125] 張佩綸寫此則日記時，人在天津。當時的天津不但是北方的一個重要口岸，還是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的官署所在地，所以，北京琉璃廠的文物商們常攜帶書畫前往津門兜售。[126] 張佩綸的記載說明，京師收藏四王吳惲的風氣也傳到了天津。如同青銅器價格高漲導致刻偽銘文，四王吳惲價格的飆升，也引來大量的作偽行為。對藝術史來說，禍兮福兮，一言難盡。

那麼，四王吳惲在南方的市場價格如何呢？江南是四王吳惲的故鄉，那裡的文人自然更可能具有相近的藝術趣味。其實，南方的古書畫市場在一八七〇年代的後期以後，價格也不斷在上漲。約在一八八一年，吳雲在致張之萬（1811-1897）的信箚中說：「南中書畫，近益少見，稍可入目，價便不貲」。[127] 顧文彬的日記記載，

121（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4，頁 1473。
122（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5，頁 1989。
123（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5，頁 1997。
124（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5，頁 2204。
125（清）張佩綸，《澗於日記》，頁 1349。
126 這點在張佩綸的日記中所載甚多。
127（清）吳雲，《兩罍軒尺牘》，卷 7，頁 44b（538）。此箚的無日期，但下一箚談到顧文彬的兒子顧承病重不起，顧承於一八八二年七月突然去世，此箚應書於一八八二年七月前，此處暫訂為一八八一年。

光緒六年（1880）三月二日，「有盛寅谷、程小廬來訪，出示書畫求售。余得其陳白陽芭蕉、嚴蓀友（繩孫）〈茂陵秋雨圖〉（贈與朱竹垞者）兩軸，價三十三元。尚有王石谷山水、惲南田墨荷兩軸，議價不諧，為香嚴售去，價二百二十元」。[128] 顧文彬提到的四件畫作都是立軸，價格通常較低。其中吳門畫家陳淳（1483-1544）和清初著名文人嚴繩孫（1623-1702）所畫兩個立軸，僅約二十五兩。王翬和惲壽平的兩軸被李鴻裔（香嚴）所購，成交價約一百五十兩，這個價錢在一八八〇年並不比京師便宜多少。但是，我們閱讀《過雲樓日記》不難看出，不光是四王吳惲的畫價，南方的書畫價格總的來說是低於京師的。顧文彬在同治十三年（1874）八月廿四日的日記中寫道：「余在京時見扇面聲價甚重，明人中有文、沈、唐、仇四家者，國初人有四王、惲、吳者，參以他家，每本十二頁，可得百金，且要者甚多，大可居奇。若在他處，斷不能得此善價。故欲售去扇面，必應寄與京友。」[129]

吳雲在一八七二年冬致陳介祺的信中說：「子山（顧文彬）收藏至富，尤喜四王吳惲類，皆以重值得之」。[130] 太平天國攻陷蘇州和浙江一些城市時，顧文彬和吳雲同在上海，一起謀劃中外會防上海。當時一些江浙士紳帶著自己的收藏避居上海，吳雲在上海期間，經常逛古董店。[131] 吳雲在致許槤（1787-1862）的信中說：「庚申變起，家藏書籍碑版與拙著各稿竟蕩焉。無隻字獲存。亂後寓滬，凡蘇杭嘉湖流傳書畫金石，都集於此。懸金訪購，舊藏既有收回，新得又復不少」。[132] 蘇州、杭州、嘉興、湖州宋元以來就是最富庶之地，收藏聚集之地。如今，這幾個地區未被戰爭毀壞的文物都聚集到上海，為吳雲和顧文彬等避居上海的官員們提供了難得的收藏機遇。吳雲在致顧文彬的信中說：「兵燹以後，東南巨跡我二人所得不少，尊處愈多，惟中間尚有致疑可商之件，將來似必歸弟審確而後入錄，務使此書一出，有識者擊節稱賞，歎為一代必傳之書，駕《消夏錄》、《書畫舫》而上之，方為墨林快事」。[133]《消夏錄》指孫承澤（1593-1676）的《庚子消夏錄》，《書畫舫》指張丑的《清河書畫舫》（1616 年成書），是明末和清初兩部著名的書畫著錄。因此，吳雲此處所說他和顧文彬在太平天國以後購入的巨跡，乃指書畫。可以推斷，

128（清）顧文彬撰、李軍整理，《過雲樓日記》，頁 100。

129（清）顧文彬著，蘇州市檔案局、蘇州市過雲樓文化研究會編，《過雲樓日記》（點校本），頁 311。

130（清）吳雲，《兩罍軒尺牘》，卷 9，頁 14b（662）。

131（清）吳大澂，《窓齋日記》，載祁寯藻、文廷式、吳大澂等著，《青鶴筆記九種》，收入《近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134、135、138。

132（清）吳雲，《兩罍軒尺牘》，卷 1，頁 32b（78）。

133（清）吳雲，《兩罍軒尺牘》，卷 7，頁 22b（494）。

《過雲樓書畫記》所著錄的顧氏收藏，有相當一大部分來自於戰後的收藏。

顧文彬是當時南方的一大書畫收藏家，《過雲樓書畫記》著錄了他收藏的繪畫作品 188 件，其中吳門四大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畫作 44 件，四王吳惲的作品 42 件，也就是說，雖然吳雲說顧文彬「尤喜四王吳惲類」，但這並不意味著對其他文人畫家的忽視，他對吳門四大家也同樣的喜愛。

吳雲本人的書畫收藏中，也頗有四王吳惲之跡。他在致勒方錡（1816-1880）的信中說：「石谷山水立軸，系敝篋舊藏，雲山杳靄，樹石蒼寒，乃此老晚年精詣，實為開門見山之作，以配新得南田小幀，可稱惲王合璧。檢奉雅賞。此等物事，兩罍軒中頗稱富有，幸勿視為鄭重麾卻之也」。[134]

我們不妨再來看看吳雲的弟子吳大澂的繪畫收藏。前面提到，吳大澂在少年時期，便受到外祖父韓崇的影響，喜歡收藏。韓崇的《履卿書畫錄稿》稿本兩冊今存上海圖書館，從中看不出對收藏四王吳惲的特別興趣。上海圖書館還藏有吳大澂的手稿《憙齋公手書金石書畫草目》，這一手稿大約書於一八九三年，列出了吳大澂所藏書畫 193 件。草目不但將四王吳惲排在第一欄，而且數量最多，共 54 件，超過總數的四分之一，其中王時敏 5 件、王鑒 6 件、王原祁 9 件、王翬 17 件、惲壽平 11 件，吳歷 5 件，《四王惲吳六大家集冊》1 件。明代中期吳門四家的作品 32 件，約占總數的六分之一。其中沈周 10 件，文徵明 15 件，唐寅 3 件，仇英 4 件。值得注意的是兩位清代中晚期的官員書畫家湯貽汾（1778-1853）和戴熙（1801-1860），人稱「湯戴」，吳大澂收湯貽汾作品 8 件，戴熙作品 9 件。頗能反映晚清官員在繪畫方面的趣味。這三部分的作品加起來，共 95 件，差不多是所藏書畫總數的一半。吳大澂曾於一八七〇年代供職翰林院，在京師居住了四五年，以後一直在外省為官。他對四王吳惲的愛好究竟是受到了京師收藏風氣的影響，還是作為一個蘇州人，前輩鄉賢的畫風早就成為了他藝術趣味的一個重要構成。不管前因後果為何，他的書畫草目反映出，溫文儒雅的正統畫風是晚清官場的主流審美時尚。

不過，並非所有的重要文化人物都追隨收藏古書畫中的主流審美時尚。吳雲在致陳介祺的信中說：「此間字畫價值雖昂，尚可物色。近人小品篋中亦頗不乏。如有所需，望即指示，當圖奉報。若由弟檢寄，或不合尊意，徒增此投報形跡。昔子貞兄喜收字畫，或以趙董及惲王諸跡見贈，一笑置之。若以黃石齋、倪鴻寶、傅青

134（清）吳雲，《兩罍軒尺牘》，卷 4，頁 18b-19a（264-265）。

主諸跡相貽，如獲異寶。蓋人有偏耆也」。[135] 子貞即何紹基，他本人的書法引導著晚清的主流書風，但在繪畫方面卻對四王吳惲興趣不大。

四、何謂收藏？

以上關於晚清文物市場和官員收藏活動的討論，可以引出下列問題：研究晚清官員的收藏有何特殊意義？吳大澂及其友人的收藏活動具有多少代表性？

前文指出，晚清官員的收藏對象，除了少數域外金石拓片外，主要是中國金石書畫，這是行之久遠的文化傳統。不過，西風東漸之際，有些官員對西方文化極有興趣，並開始收藏西方藝術品。曾紀澤（劼剛，1839-1890）在出任大清國駐英法俄大臣前，就已經下洋棋，玩洋玩物，看洋書，觀洋畫。[136] 一八七八年出使歐洲後，他造訪西方畫廊，參觀博物館，並把博物館藏品分為「有用之藝」（包括建築），和「耳目之玩」（繪畫、雕刻等）。[137] 由於洋畫的價格較貴，曾紀澤在赴歐前帶了一些中國書畫，以備佈置室內環境之用。[138]

在歐洲，曾紀澤開始購買一些價格比較便宜的油畫及複製品，他的日記記載：「茶食後，偕清臣、藹堂遊市肆，購洋畫、筆墨等件」。在法國，「至畫店購假油畫廿餘幅，較德國價廉數倍，可怪也」。「購買假油畫，選擇甚久」。「步遊市肆，購洋畫歸」。[139] 喜歡繪畫的曾紀澤還嘗試作油畫：「飯後，清查所購油畫顏料之匣」。「畫宮扇，水畫者兩柄，油畫者二柄」。[140]

一八八六年，駐歐八年的曾紀澤回到京師，與翁同龢等共事。他繼續和外國使節、醫生、教習保持密切交往，並用從歐洲帶回的洋畫佈置居室。對此，翁同龢的印象甚深：「散後訪晤曾劼侯，福公亦來，其屋內陳設皆西人式也」。「申正詣劼剛

135（清）吳雲，《兩罍軒尺牘》，卷 9，頁 45a（723）。《兩罍軒尺牘》雖刪去的信箚的日期，但從內容來判斷，是按年代先後來編排的，此箚約寫於 1878 年左右。

136 見（清）曾紀澤；劉志惠點校輯注，《曾紀澤日記》（長沙：嶽麓書社，1998，冊上，頁 140、141、637、141、264）。但是，曾紀澤所看的「洋畫」，很可能是複製品畫冊，如他在日記中寫道：「看洋畫一冊。」頁 264。

137（清）曾紀澤，《曾紀澤日記》，冊中，頁 876、888。

138「清檢篋中攜來書畫，欲於移寓時補壁，以省洋畫之費也。」（清）曾紀澤，《曾紀澤日記》，冊中，頁 851。

139（清）曾紀澤，《曾紀澤日記》，冊中，頁 1102、1107；下冊，頁 1360。

140（清）曾紀澤，《曾紀澤日記》，冊下，頁 1476、1824。

處飯，燮兄、頌閣同坐。看洋畫，燈紅酒綠，儼然西人也」。[141] 不過，像曾紀澤這樣欣賞和收藏洋畫的官員，稀若鳳毛麟角。[142]

如果說，一八七二年卜世禮在琉璃廠出重價購買青銅器還只是初試啼聲的話，[143] 十多年後，情況開始大大改觀。葉德輝（1864-1927）在談到宋元畫價格在十九世紀末後開始高漲時說：「光緒中葉，海西各國爭收中國舊槧破緣，一時宋元又聲價陡起」。[144]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歐美日收藏家購藏中國文物漸成風氣和規模。[145]

限於資料，我們對晚清在上海崛起的商人收藏家（如顧壽臧等）的瞭解甚少。但種種跡象表明，當時上海有著相當一批商人、實業家、買辦收藏文物。可以推想，在其他的口岸城市（如天津、廣州等），類似的收藏群體也同樣存在。中國歷史上從來都有富商巨賈收藏古董，明代中期的項元汴，清代初期的安岐，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大藏家。只不過，在傳統中國，財富的擁有者不見得在文化上具有話語權。葉昌熾在光緒十三年（1887）正月初十日的日記中寫道：「夜蒲生來談，越州有羅姓，藏書畫至二萬軸，人稱萬軸羅家。其先為鹽商紀綱，故士流屏不與齒。趙撝叔獨羈縻之，得遍觀其寶笈。撝叔畫訣由此大進」。[146] 這個例子或能說明，在十九世紀的下半葉，士大夫對商人收藏家依然持有文化上的優越感，依憑著政治地位和文化優勢，他們操持著藝術收藏和品鑒的話語權。進入二十世紀之後，隨著文

141（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5，頁 2188、2285。

142 如曾紀澤的繼任劉瑞芬（1827-1892），即收藏古書畫。參見（清）莫友芝著；張劍點校，《郘亭書畫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2008）。劉瑞芬的兒子劉世珩（1874-1926），更是中國古代文物的大收藏家。晚清著名外交家張蔭桓（樵野，1837-1900）也收藏書畫。翁同龢記載：「張樵野以惲畫山水屬題，尚好」。「未正，張樵野來看我藏畫」。（清）曾紀澤，《翁同龢日記》，卷 4，頁 1873、1921。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北山堂舊藏翁同龢致張蔭桓九箚，除了談政事外，亦頗有涉及書畫事。見莫家良編，《北山汲古——中國書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藝術系，2014，別冊），頁 210。

143 西方傳教士和到中國來做生意的商人出自獵奇的心理而購買一些中國藝術品，可以追溯到更早，在清代也是如此。如一八三六年，梁章鉅（1775-1849）就曾和洋商在北京爭購華陰本〈華山碑〉。參見施安昌編，《漢華山碑題跋年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 21。卜世禮的動機明顯不同，他是為了探究一個不同的文明而購藏的。

144（清）葉德輝，《觀畫百詠》（1917 年）。引自黃小峰，〈「隔世繁華」：清初「四王」繪畫與晚清北京古書畫市場〉，頁 168。

145 參見 Thomas Lawton and Thomas W. Lentz. *Beyond the Legacy: Anniversary Acquisitions for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Washington D.C.: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1998), 19-79; Aida Yuen Wong,"Naitō Konan's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in Joshua A. Fogel, ed., *Crossing the Yellow Sea: Sino-Japanese Cultural Contacts, 1600-1950* (Connecticut: East Bridge, 2007), 281-304; 洪再新，〈藝術鑒賞、收藏與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居廉、伍德彝繪潘飛聲〈獨立山人圖〉為例〉，《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 年 2 期，頁 6-25。

146（清）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本，冊 3，頁 1266）。

人士大夫階層的消失，士農工商的傳統等級觀念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實業家、商人在收藏界變得越來越重要。以此觀之，本文研究的一八六〇至一八九〇年代，正是西方收藏家尚未大規模介入、商人收藏群體尚未取代文人士大夫階層而成為收藏主體的最後時代。晚清官員留下的文獻資料，使我們能夠比較細緻地觀察歷史大變遷之際的收藏活動。

本文提到的吳大澂及其師友都是政府高官。吳大澂官至河東河道總督、湖南巡撫，潘祖蔭官至尚書、大學士，貴為兩代帝師的翁同龢也曾任尚書、大學士，沈秉成官至兩江總督，李鴻裔曾任江蘇按察使，顧文彬曾任浙江寧紹道台，王懿榮官至國子監祭酒。吳雲在這批官員中的職位最低，曾任蘇州知府，但卻是一個富庶並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很有影響力的地區的行政首長。人們可能會問：吳大澂這個圈子在上層官員中是否具有代表性？

回答是肯定的。在晚清的高官中，收藏金石書畫是極為普遍的現象。零星的記載告訴我們，很多高官雖不以收藏著稱，但卻都或多或少地有著金石書畫的收藏。《翁同龢日記》除了記載本人的收藏活動外，還不時提及同僚的收藏。當時高官請人吃飯，常向來客展示字畫。光緒八年（1882）三月十七日，翁同龢「邀張子青便飯，蔭軒、蘭翁作陪，晚始罷。看畫帖極樂，子青於〈長江萬里卷〉擊節不已也」。[147] 翁同龢在一八七五年用四百兩銀子買下的王翬《長江萬里卷》，成為這次聚會中觀賞活動的亮點。

光緒八年（1882）七月初七日，翁同龢赴禮部尚書李鴻藻（蘭蓀，1820-1897）家宴，「張子青、徐蔭軒、祁子禾同坐，……觀字畫，極樂」。翁同龢記錄了當日所觀字畫：

> 張得天與張晴嵐尺牘二冊，又二冊（刻於玉虹堂）；石谷畫冊，夢樓題詩；薩天錫日記四冊（內《客杭日記》已刻，餘尚多）；孫高陽畫像（愚公山人王餘佑隸書）；御史五德仿西法畫（成王題）；清湘道人畫卷（極奇，滿紙無餘）；王孟端軸；文衡山軸（小楷題）；郭河陽立軸（不真而舊）；石庵大對。[148]

如果此次聚會觀賞的字畫都是李鴻藻所藏，那李氏收藏應甚具規模，此僅其中一小部分。

147（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4，頁 1694。
148（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4，頁 1714。

光緒九年（1883）正月廿八日，翁同龢：

> 詣張子青前輩飯，李蘭翁、徐蔭軒、廣紹彭、許星叔同坐，申正散。……在子青處得見所藏高房山為鮮于伯幾畫雲山卷（張丑跋），王蒙為馬文璧畫卷（卞令譽藏），錢舜舉畫瓜，宋高宗竹雀（子昂跋）。皆無上妙品。石谷畫卷（惲題、笪題、錢朝鼎跋）。又畫冊十幅，亦世不多覯也，飽看而歸，猶有餘味焉。[149]

張子青即張之萬（1811-1897），此時任兵部尚書，他本人不但擅長山水，收藏書畫也相當可觀。

以上所言，皆宴主以家藏字畫饗客。有時則是參加聚會的友朋各自帶上字畫赴宴。光緒十三年（1887）二月十七日，翁同龢：

> 詣頌閣處，借伊庖人請客也（並借朱曼伯庖人燒鴨、燒火腿）。倪豹岑、朱曼伯、敬子齋、孫燮臣、徐頌閣各攜書畫賞之，沈仲復來則飲罷將散矣。以松花江水烹茶款之，一笑。倪豹岑所收（南宋畫院朱銳〈明皇幸蜀圖〉立軸，王叔明〈草堂圖〉軸），頌閣所藏（李晞古〈大禹治水卷〉、群玉堂米帖三卷），皆妙。[150]

翁同龢、倪文蔚（豹岑，1823-1890）、朱壽鏞（曼伯）、敬信（子齋，1830-1907）、孫家鼐（燮臣，1827-1909）、徐郙（頌閣，1836-1907）、沈秉成在聚會時各自攜帶字畫來觀賞。如果不是翁同龢的記載，今天我們又會知道其中有幾人收藏書畫。

以上提到的人物，不少和晚清政治中所謂的「清流」頗有干係。但是，我們從張佩綸的日記中得知，洋務運動的領袖李鴻章（1823-1901）也有書畫碑帖收藏，雖然李鴻章本人可能並不熱衷收藏。洋務運動的另一位核心人物盛宣懷（1844-1916）也有收藏。吳大澂逝世後，他的幕僚、畫家陸恢（1851-1920）為盛宣懷和龐元濟的收藏活動掌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所藏盛宣懷檔案中，有陸恢致盛宣懷信箚談及收藏：

149（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4，頁 1761。「卞令譽」應為「卞永譽」之誤。

150（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卷 5，頁 2131。翁同龢的日記中，還有一條類似的記載：十一日，「未初詣（徐）頌閣處飲，倪豹岑、朱曼伯、敬子齋、沈仲復、孫燮臣同座，各攜字畫，暢觀甚樂，抵暮散。」同上，頁 2129。

> 承示宋馬和之十六應真卷，此卷在數日前已有持來，索值千金。龐氏因佛像不收，故卻之。恢展玩一二次，細審用筆，卻是古物。即置諸收藏名跡中，亦可比數。惟本人無款，崇禎時楊題是真，吳梅村尚好，莫雲卿引首筆意不大象，且索價千金亦太昂。若以一二百尚可得也。請宮保大人裁奪。[151]

當本文把官員的收藏活動和文物市場聯繫起來時，「文物」這一現代概念主要指向歷史遺存。通過購買的手段，將古代的藝術品購入並保存和欣賞，這就可稱為收藏活動了。不過，「收藏」在這裡還只是一個寬泛的概念，落實到具體的實際情況，人們的參與程度是不同的，古代便有賞鑒家和好事者的區分。而收藏活動又可以根據主觀意願和參與程度來分為積極性收藏和消極性收藏。

吳大澂的至交顧肇熙（1841-1910）在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十七日午後：

> 訪清卿於吳平齋太守公館，並晤廣盦，看李錦鴻所拓平翁收藏吉金十六幅，多儀征相國積古齋中物。因悟物理，久聚必有一散，群聚必有群散，散而復聚，未必適完其舊也。故莫妙於無聚無散，來去聽之，其中無我之見存。余年來交清卿，覺耆欲差澹，唯好古著書畫，每見輒涎之。坡公云，翰墨之清虛，不減於聲色貨利，戒之、戒之。[152]

顧肇熙也是蘇州人，對家鄉的收藏風氣不可能不知，他說吳大澂並無很多的嗜好，但是看到古董便垂涎欲得。吳大澂和潘祖蔭這些官員積極購藏又精於品鑒，當然是賞鑒家。

迫於同儕壓力或仰慕精英生活方式而附庸風雅的「好事者」，遠遠多於賞鑒家。由附庸風雅而好之、樂之，進而鑽研之，從好事者轉變成賞鑒家也並非不可能。賞鑒家和好事者的收藏，都屬於積極性收藏。

在金石書畫的收藏中，青銅器屬出土古物，數量少，收藏的人也少，除了極少數為贈品和家族遞傳外，[153] 主要通過市場買賣獲得。和青銅禮器只產生於某些特定

---

151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史料叢刊，王爾敏、陳善偉編，《近代名人手劄真跡》（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7，冊 4），頁 1789-1790。在致盛宣懷的另一劄中，陸恢寫道：「宮保大人侍史，今日攜奉倪雲林山水軸，與昨上吳雲墨字卷，皆沈研傳觀察之物。此二件彼要售銀二千二百兩。菉臣本想留畫，而價值有低昂。兩物不能平稱，故恢代呈請示。」同上，頁 1796。

152（清）顧肇熙，《顧肇熙日記》（江蘇：蘇州圖書館藏稿本）。

153 如左宗棠為報答潘祖蔭知遇之恩，購得大盂鼎贈送給潘。吳雲去世後，其青銅器收藏由其子吳承潞繼承。

的歷史時期不同，書畫是活著的藝術，歷代的文人都在持續參與，吳大澂和他的友人也不例外。文人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參與的全面性，一個文人可能同時兼具幾種身份：收藏者、品鑒者、創作者。當顧肇熙評價吳大澂「唯好古著書畫，每見輒涎之」時，他說的「古著書畫」當然是今天所理解的「古代藝術品」。但是這個「古」和商周青銅器是上古遺物不同的是，它既可指唐宋元的書畫，也可指本朝的書畫。而書畫中的「書」由於「翰墨」這一概念寬泛的涵括性，一些古代的禮品和日常書寫也都可以囊括進去。

在書畫收藏中，家傳、交換、贈送的現象也很普遍，通過市場來購買只是其中的一種方式。在吳大澂的時代，明清書畫並非稀有，士大夫之間互相贈送的現象屢見不鮮。顧文彬光緒六年二月十六日日記記載，「張子青先生有書來，並惠張二水字卷，答書交來使帶回，以董思翁山水伴函」。[154] 張之萬以張瑞圖（二水，1570-1644）書法卷相贈，顧文彬報以董其昌山水。

陳介祺曾委託吳雲在蘇州一帶尋購元代畫家吳鎮（1820-1354）的竹石小軸，吳雲回信說：「謹當力為搜羅，倘一時不得，亦必向親友力索一二件以副誠諉。俟韓兄北旋時，託其帶呈法鑒，合則付價，或易全形拓。否則仍將原件攜還，至妥辦法也」。[155] 吳雲說，他會盡力幫陳介祺在蘇州一帶尋覓吳鎮的繪畫，找到的話，托人帶給陳介祺，陳若滿意，可以付錢，也可以用所藏青銅器的全形拓來交換。

古代的書畫可以交換，當代的更能如此。吳雲致陳介祺信云：「茲有舍親沈仲復方伯欲求法書小額楹聯，備有宣紙，託為轉懇。附呈虢鐘、頌敦全形拓本兩分，統希鑒入，傳古盛事，甚盼覆音」。[156] 吳雲代沈秉成求陳介祺書寫匾額和對聯，報酬是送上兩份沈秉成所藏虢叔鐘和頌敦的全形拓。

前文已經指出，晚清文物市場上流通的許多藝術品在製作的時候是禮品，藝術禮品的消費在日常生活中是大量的，流通的方式有主動贈送、互贈、索求、代求等。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昔日的禮品和許多日常書寫（如信箚、筆記、詩文稿、日記等）一起，有了市場價值。吳雲在一八七五年致鍾佩賢（1850 年進士）的信箚中寫道：「鄭盦（潘祖蔭）月必有書箚往還，無非為金石考證。間有索及書畫者。郵簡裁報必出親書，從無假手於人。彼見兄字跡澤潤，終不信病體至於此

154（清）顧文彬撰、李軍整理，《過雲樓日記》，頁 100。
155（清）吳雲，《兩罍軒尺牘》，卷 9，頁 43b（720）。
156（清）吳雲，《兩罍軒尺牘》，卷 9，頁 36b（706）。

也」。接著一通：「往年伯寅尚書來書云，將鄙人惡劄裝成兩巨冊，使琉璃廠多一有名遺跡，語甚涉趣」。[157] 潘祖蔭把吳雲寫給他的信劄裱成兩大冊頁，要「使琉璃廠多一有名遺跡」，似乎在開玩笑，其實彼此都很明白，他們的信劄日後都能成為琉璃廠標價買賣的文物。從日常書寫和禮品向具有市場價值的「文物」轉換，悄然無聲，擁有它們的人們有一天會突然發現，它們能標價出售了。

吳雲和潘祖蔭畢竟都是晚清著名的賞鑒家，收藏意識很強。但是那些並不熱衷於收藏古代藝術品的官員，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可避免地向他人索求書畫、為他人作書畫、與人通信。顧肇熙同治三年（1864）四月十二日日記記載：「為誼卿書扇一柄」。誼卿即吳大澂的弟弟吳大衡（1838-1896）。同治十一年（1872），亦即潘祖蔭和吳大澂在京師積極購藏青銅器時，顧肇熙也在北京。他的閏六月日記記載：初一日「為香濤寫扇」。初六日，「連日寫扇對」。初十日，「香濤扇對數十，至是始了」。[158] 香濤即張之洞，這一年他被任命為四川學政，赴任前，請顧肇熙在十天內書寫了數十件扇對，大概是作禮品之用。作為吳大澂的至交，顧肇熙和吳大澂之間的往來信劄很多，今天尚有不少吳大澂致顧肇熙的信劄存世。由於顧肇熙沒有將這些信劄毀棄，他的家人就自然而然地有了「收藏」。這就是消極性「收藏」。以此觀之，「收藏」的概念和群體將極為擴大。

受經濟能力的限制，收藏古代文物的人們總是會相對少些。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中國社會的精英們，自上而下都在消費著大量由同代人製作的書畫。晚清的下層官員楊葆光（1830-1912）在其日記中，記載了為友朋製作的大量書畫，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這些書畫是主動送人或他人索求的。[159] 由於這些友朋的地位不如吳大澂的友人那樣顯赫，已多不可考。但是，我們從中卻不難感受到書畫在日常生活中的頻繁使用。從這點來說，整個傳統社會精英的文化消費模式，無論是上層還是下層，基本相同。所不同者，有的人購藏已經成為「文物」的書畫，有的人索求尚未成為、但將會成為「文物」的書畫。與此同時，他們也創作書畫，不斷為後人留下可資收藏的文物。這並非是晚清所特有的文化現象，而是二十世紀之前一個綿延不斷的傳統。無論是潘祖蔭、翁同龢、吳大澂，還是顧肇熙、楊葆光，本文提到的

157（清）吳雲，《兩罍軒尺牘》，卷 6，頁 24b-25a（432-434）。

158（清）顧肇熙，《顧肇熙日記》（江蘇：蘇州圖書館藏稿本）。

159（清）楊葆光著、嚴文儒等校點，《訂頑日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楊葆光，字古醞，號蘇庵，別號紅豆詞人，華亭人，曾官龍遊、新昌知縣，學問淵博，著作等身。兼工書畫。書法晉唐，風格遒勁。

所有官員都有書畫作品出現在今天的拍賣會上，名氣有大有小，價格或高或低，但都已在文物市場上流通。只不過，購買和收藏它們的人們大多已經不再具有官宦身份。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清）王懿榮，《王懿榮書劄》，上海：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清）江標，《笘諺日記》，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稿本。

（清）吳大澂，《吳大澂書劄》，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稿本，編號 4803。

（清）吳大澂，《吳大澂書手劄》，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編號 17678。

（清）吳大澂，《吳大澂致潘祖蔭信劄》，北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清）吳大澂，《吳愙齋尺牘》，上海：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清）吳大澂，《愙齋家書》，上海：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清）吳大澂，《愙齋赤牘》，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

（清）吳大澂，《愙齋日記》，載祁寯藻、文廷式、吳大澂等著，《青鶴筆記九種》，收入《近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7。

（清）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清光緒二十年刊本）

（清）吳大澂，《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光緒十一年刻本）

（清）吳雲，《兩罍軒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影印光緒甲申刊本。

（清）莫友芝著；張劍點校，《郘亭書畫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2008。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上海：中西書局，2011。

（清）徐珂編，《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

（清）陳介祺，《簠齋尺牘》，臺北：古亭書屋，1969 年影印本。

（清）曾紀澤著；劉志惠點校輯注，《曾紀澤日記》，長沙：嶽麓書社，1998。

（清）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本。

（清）張廷濟，《銅器聞見錄：張叔未書劄》，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潘祖蔭抄本。

（清）張佩綸，《澗於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清）楊葆光著；嚴文儒等校，《訂頑日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潘文勤，《潘文勤公與愙齋尚書手劄》，江蘇：蘇州博物館藏，顧廷龍抄本。

（清）潘文勤，《潘文勤公書劄》，上海：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清）顧文彬撰、李軍整理，《過雲樓日記》，收於蘇州市檔案局編，《蘇州史志資料選輯》，蘇州：蘇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2011，37 輯，頁 92-119。

（清）顧文彬著；蘇州市檔案局、蘇州市過雲樓文化研究會編，《過雲樓日記》（點校本），上海：文匯出版社，2015。

（清）顧肇熙，《顧肇熙日記》，江蘇：蘇州圖書館藏稿本。

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箚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

二、近代論著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圓明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王玉良、程有慶編，《趙之謙信箚墨蹟書法選》，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3。

白謙慎，《吳大澂和他的拓工》，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

白謙慎，〈晚清官員日常生活中的書法〉，《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2014 年 1 輯，頁 240-245。

李萬康，《編號與價格：項元汴舊藏書畫二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

李萬康，《中國古代繪畫價格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呂偉達編，《王懿榮集》，濟南：齊魯書社，1999。

沈紅梅，《項元汴書畫典籍收藏研究》，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

松丸道雄，〈陳介祺與蘇氏兄弟——關於陳氏的古董收集〉，孫慰祖等編，《陳介祺學術思想及成就研討會論文集》，杭州：西泠印社，2005，頁 340-342。

邵義，《過去的錢值多少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史料叢刊，王爾敏，陳善偉編，《近代名人手箚真跡》，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7，冊 4。

施安昌編，《漢華山碑題跋年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洪再新，〈藝術鑒賞、收藏與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居廉、伍德彝繪潘飛聲〈獨立山人圖〉為例〉，《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 年 2 期，頁 6-25。

莫家良編，《北山汲古——中國書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藝術系，2014，別冊。

梁元生著、陳同譯，《上海道台研究——轉變社會中之連絡人物，1843-18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黃小峰，〈「隔世繁華」：清初「四王」繪畫與晚清北京古書畫市場〉，《藝術史研究》，2007 年 9 輯，頁 165-191。

葉梅，《晚明嘉興項氏法書鑒藏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6。

楊端六編，《清代貨幣金融史稿》，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楊麗麗，《天籟傳翰：明代嘉興項元汴家族的鑒藏與藝術》，臺北：石頭出版社，2012。

謝國楨編，《吳愙齋（大澂）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

顧廷龍，《吳愙齋先生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

Busehll, Stephen W.. *Chinese Art Second Edition*. London: The Board of Education, 1924.

Lawton, Thomas and Lentz, Thomas W.. *Beyond the Legacy: Anniversary Acquisitions for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Washington D.C.: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1998.

Wong, Aida Yuen. “Naitō Konan’s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in Joshua A. Fogel, ed., *Crossing the Yellow Sea: Sino-Japanese Cultural Contacts, 1600-1950*. Connecticut: East Bridge, 2007, 281-304.

A Preliminary Study About the Antiquities Market and Collecting Activities of Offici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ai Qianshen
Cultural Heritage Institute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history of collecting art, the antiquities market is by all means an important link that cannot be overlooked.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ed amount of documentation available, studies on collecting history rarely touch on this market. Fortunately, the amount of related material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is quite plentiful. As a resul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ntegrate the price fluctuations in the markets for bronzes as well a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s a means to discuss the collecting activities of officials during this period. In doing so, it offers observations on the modes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on the part of Chinese social elite during this tumultuous time in history.

Keywords: Late Qing, collecting, antiquities market, bronze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圖 1　周　虢叔旅鐘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2　虢叔鐘拓片　私人收藏



圖 3　清　吳大澂　為顧壽臧作山水　1875 年
私人收藏



圖 5　清　王原祁　杜甫詩意圖
翁萬戈先生藏



圖 4　清　王翬　長江萬里圖　局部　翁萬戈先生藏